

第十三章

從文化交流看郁達夫 與陳馬六甲的跨境之旅

本章要從跨界的角度來討論東南亞與華文世界有關的越境之旅，分別討論兩段特殊的旅程，看看從不同的視角可看到不同的交流史的意義。我們要借用不同旅行文學的材料來討論對異域的探索，與異文化接觸經驗的呈現。這兩段旅程分別是太平洋戰爭時期華文作家郁達夫到蘇門答臘的死亡之旅，以及戰前印度尼西亞革命家陳馬六甲(Tan Malaka)到中國的化身之旅。這兩段旅程差不多都是發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這是一個變動的時代，可以看成亞洲地區人們交互旅行、克服文化障礙的時代插曲。放在亞洲不同族裔文化之間的互動與交流來看，中華文化和印尼／馬來文化之間雖然在歷史上有各種實質的接觸，心靈世界卻是缺乏相互瞭解的，歷史上的誤解深重一直累積到現在，從這個角度說，郁達夫和陳馬六甲的越境之旅顯然是極為罕見的，應該視為亞洲民眾交流史的英雄事蹟。不幸的是，由於其旅行記錄不是記載於傳統的旅行文藝之中，故一直為人所忽視。

郁達夫在太平洋戰爭時期逃亡蘇門答臘島，喬裝成當地富商，學習馬來話及荷蘭語，後來竟成為日本通譯，周旋於日軍、印尼兵、荷蘭戰俘與華僑之間。這一段事蹟對於郁達夫這樣一位富有盛名的文藝作家而言顯然是難以定位的，雖然郁達夫的古舊寫了許多關於這段旅程的回憶，旅程本身的傳奇性也足以吸引讀者注意，但是卻是和郁達夫的作家生涯難以連繫在一起，只是被視為作家個人一段不幸的遭遇。吊詭的是，郁達夫這一位作家，這一段旅程的記錄都是旁人完成的。一位最積極提倡旅行文學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健將，對自己人生最後一段戲劇性的旅程，卻無法自己執筆寫遊記，反而是由他人不斷地回憶追索，拼湊出旅程的不同面貌。

陳馬六甲是印度尼西亞左派革命家，是印尼唯一跨越 1920 年代和 1940 年代兩次革命風潮，最富傳奇與神秘色彩的革命英雄。他和華人沒有任何血統上的關係，卻在兩次革命之間流亡海外長達 20 年的期間，化身為菲律賓華僑及夏威夷華僑，藏身在中國南方與香港，以及側身南洋的華人社群之間，考察中國革命情勢等，以圖謀日後印尼革命之再起。主要記錄其旅程的著作，是他在監獄中所撰寫的自傳，可說是印尼／馬來文學中迄今少有可出其右的傳記體巨著。³³¹不幸的是，這本自傳如同陳馬六甲本身的遭遇，

³³¹ 陳馬六甲所寫的自傳，Tan Malaka, *Dari Penjara ke Pandjara*. [從監獄到監獄] Djogjakarta: Pustaka Murba, 1948.

現在仍然漂流海外，在印尼本國則遭到查禁的命運。無疑地這段中國華南／南洋華社的化身之旅，對於革命家的一生而言，難以被當地富有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國族論述歷史觀所理解。

郁達夫的死亡與陳馬六甲的流亡日後成為華語世界及印尼語世界不斷被追憶的軼事，卻因其跨越不同的文化界限，難以在各自原有的文化體系中被適切地理解。其旅行記錄不論在形式、文類與文學成就，都和一般的旅行文藝不盡相同，其文藝活動或書寫長期被排斥在相關的文學範疇之外，可從中引發不少有別於傳統旅行實踐與旅行文藝之關係的討論。本文特別將兩個不同方向的旅程放在一起討論，以介於兩個文化體系之間的旅行實踐視之，在不同文獻中挖掘片斷、排比話語、重建旅程與文藝活動的關係，一方面從亞洲民眾交流史的立場來討論其經驗，另一方面則將之放入印尼／馬來／馬華文學的討論脈絡中，以創造其在文化史的可能意義。

許多旅行文藝研究討論的多半是西方旅行家到了亞洲或是太平洋等異地，呈現出來的是自然是西方眼光下的異己文化，看待旅行地的眼光則涉及殖民宗主國與被殖民國家，或是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的關係，相關研究的論述也建立在這種關係之上。然而亞洲各地之間的關係，像華文世界和印尼／馬來文世界的關係如何，其實很難以同樣的方式來討論，應該發展不同的理解架構，而對不同面貌的文化接觸與文化關係有進一步的理解，同時不能

只是一直停留在外交史的理解層面，以華文世界與印尼／馬來文世界的長期隔閡與接觸，致力挖掘歷史上能達到不同接觸與交流境界的事蹟，對於長期籠罩在政治扞格關係中的民眾交流才有更多的理解。

跨越文化與地理邊界的旅者

這裡必須先介紹兩位旅者，因為兩位旅行的主角都是知名人物，其軼事即使不放在異域旅行的角度也有探討的價值，倒過來說，假如同樣的旅程發生在其他人身，未必會得到相同程度地矚目。具體而言，郁達夫同樣的旅程換上別人，得難會有記述其旅程的文字記錄不斷湧現的情況出現。³³²同樣的道理，如有陳馬六甲同時代的印尼人曾經到中國華南旅行或是住上幾年，對照當時印尼知識人的心靈世界，主要關心的是歐洲與荷屬東印度的互動，將少有人覺得有詳細記錄的必要。³³³這兩段旅程之所以留下

³³² 郁達夫當時因為太平洋戰爭之故而由新加坡躲避到蘇門答臘島，同時間由星馬到蘇島避難者，少說也有幾千人之譜。即使將對象縮減到當時所稱的文化人，則在陳嘉庚的協助下有三十幾人同時逃往蘇島，其他自行逃往該島也不在少數。但在日後關於這一經驗的文字記錄上，除了小說家巴人以此自身經驗寫了紀實小說，其他多數都是和郁達夫有關的記述。巴人的小說，見巴人，《印尼散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有關郁達夫的記錄後詳。

³³³ 同一時代的旅行記錄中，陳達曾經在三十年代拜訪僑鄉時，發現在不少印尼人隨配偶回到僑鄉，也有在印尼出生的混血兒，被送回僑鄉，因此當時在華南僑鄉可以見到仍保留印尼生活習慣的印尼人或混血兒。陳達，《浪跡十年》。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

記錄，產生不同的意義，與旅行的主角直接相關。旅行是不是構成值得書寫的旅行經驗，主要還看旅者在動態中與陌生環境互動的精神狀態。在這個情況下，旅行者本身的角色是無可取代的，同一段旅程因為旅行者不同，或是不同的時空及條件下，會產生截然不同的精神狀態，形成不同的意義。

兩位主角中，郁達夫在華文世界中享有盛名，陳馬六甲則在印尼／馬來文世界中頗具名氣。³³⁴郁達夫成名甚早，今天說到 1920 年代的中國新文學運動不會不提起他的名字，不幸的是其文學風格和中國後來所強調的著重社會政治意識的文學主流大異其趣，以致於雖然早年頗有名氣，後來卻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一般對郁達夫的評價是為浪漫派作家，有時則被評為色情頹廢。他的成名作品《沈淪》則因緣際會成為中國新文學的先鋒，被認為是反叛舊禮教的作品，代表了一個新時代的開端。³³⁵其實其作品所呈

³³⁴ 在本文的論述之中，凡是提到語言和文學的部分會將馬來語和印尼語並列，這是因為在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及四十年代，馬來語和印尼語並未分家，是同一種語言同一個文學傳統，而蘇門答臘島正是處於兩個範圍的交界，雖然後來在政治上的歸屬是在印尼的範圍，在文化上則為馬來文化的發源地之一，當地仍稱其語言為馬來語，因此在此採取並列的方式，但在論述政治範圍時，則會指明是馬來亞或是印尼。關於馬來和印尼在文學之間的混同關係，最佳例證可參考 Anthony H. Johns, "Amir Hamzah: Malay Prince, Indonesian Poet" *Cultural Options and the Role of Tradition: A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Modern Indonesian and Malaysian Literature*.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124-140.

³³⁵ 1937 年葉忘憂在為現代創作文庫編輯郁達夫選集時，如此描述郁達夫的成就：「初期的創造社是以(郭)沫若的詩、劇，與(郁)達夫的小說來打下基礎的。他那些變態心理的描寫，異常大膽而忠實，曾獲得當時青年的極端熱愛。」頗

現的卻是十足的個人色彩，其關心的主題以個人情慾及困境為多，表達手法也以暴露個人內心世界的矛盾與掙扎見長，不論是小說或是其所提倡的日記體的作品都是如此。中學即前往日本深造的郁達夫，心儀的文學典範是當時日本的「私小說」(watakushi shusetsu)，³³⁶這是一種以第一人稱敘述的小說體，這一學派所強調抒發個人內心挫折、焦慮和壓力，在郁達夫的作品中清楚可見受其影響。這種風格和五四時期以後強調社會改革意識的文學風潮不甚搭調，其實不僅是新文學如此，中國文壇歷來強調文以載道，一向缺少如「私小說」這種以個人內心挫折困頓為核心的文學傳統。³³⁷

郁達夫另一個被忽略的特質，是其跨越文化障礙的能力。這個特質經常表示在其文學作品上，也可以在其生活經驗中得到印證。他早年在赴日本就讀中學時，即沈迷於各國小說，讀遍日文、英文、德文及法文的小說一千多種，只有俄文小說是讀英譯本。印證其後來所寫的散文及文藝理論，可以確知他其一直保持閱讀這些不同語言的文學作品，³³⁸同時在其作品中也經常表現出他對

能代表當時文壇對郁達夫的評價。見葉忘憂編，《郁達夫選集》。現代創作文庫。上海：中央書店，1937，第1頁。

³³⁶ 私小說的特點為取材於作者自身經驗，採取自我暴露的敘述法，自暴支配者的心理景象。小谷野敦，《私小説のすすめ》。平凡社新書，2009年。

³³⁷ 李佳，《中国の近代小説における日本の私小説的要素—創造社の身辺小説と魯迅の自我小説を中心として》。東北大学大学院，2017年。

³³⁸ 關於郁達夫平時閱讀德文與法文文學作品的情況，見郁達夫，〈我愛讀的短

各國語言的知識與興趣，郁達夫小說中的主角多半能穿透文化障礙，直接閱讀外國雜誌，和西方人直接交往等等。³³⁹除外，許多早年作品顯示出對異國女子的嚮往，主要是描述中國男子的主角和日本女子的戀情，不論是相戀或是單戀，許多被認為郁達夫真實生活的一個面相。³⁴⁰散文中更是經常賣弄他對當時西歐藝文界的熟悉程度，而在其南洋的遊記中則對當地名稱孜孜不倦地記錄其歐語、梵文、爪哇語、巽他語或暹羅語等的來源，再再顯示他對各地文化語言等的興趣。³⁴¹這種特質的理解對後來的蘇門答臘之旅很有幫助。

陳馬六甲則是華文世界比較陌生的，主要原因是做為印尼共產黨早期的領導人物，其史蹟長期受到壓抑與扭曲，而其本身一

篇小說》。《郁達夫南遊記》。台北：江南出版社，1968年，第120頁。其留心日本文藝界的情況，見郁達夫，〈戰後敵我的文藝比較〉。《郁達夫抗戰論文集》，林徐典編。新加坡：世界書局，1977年，第63頁。

³³⁹ 郁達夫的小說中，主角多為熟稔西洋文化，如「沈淪」中的「他」，心緒是在讀英文文藝作品時被挑起來。見郁達夫，〈沈淪〉。葉志憂編，《郁達夫選集》，現代創作文庫。上海：中央書店，1937年。如「迷羊」中的「我」，平常閱讀直接由英國訂來的雜誌，並且從中得到法國巴黎畫展的消息。見郁達夫，〈迷羊〉。上海：北新書局，1929年，第164頁。

³⁴⁰ 郁達夫表現類似情節的小說不在少數，最著名的是其成名小說「沈淪」，主角因為對日本女子的嚮往不能解脫，最後踏入妓院。「銀灰色的死」描寫留日學生的主角對日本女子靜兒幻想式的戀情，見葉志憂編，《郁達夫選集》，現代創作文庫。上海：中央書店，1937年。「南遷」中的伊人則對日本女學生有昇華式的戀情。見郁達夫，〈南遷〉。香港：智明書局，1958年。他自己在其自傳中也提到他在日本時對日本女子的色相的迷戀。見郁達夫，〈雪夜——日本國情的記述自傳之一章〉。《宇宙風》，第11期，1936年。

³⁴¹ 見郁達夫，〈馬六甲遊記〉。《郁達夫南遊記》。台北：大明書局。1968年，頁81。

生的經歷，也如謎一般神秘。³⁴²但是無疑地在印尼與國際的歷史學界都認可他在歷史上的地位，是印尼的開國英雄。而曾經參加過印尼革命擔任重要文宣手，後轉為歷史學家的莫哈默雅民 (Muhammad Yamin)，稱他是「印尼共和國之父」³⁴³，因為他早在 1925 年率先倡議成立「印尼共和國」，³⁴⁴而三十年代的印尼民族主義運動的重要思想宣傳文獻，許多出自流亡在外的陳馬六甲。在日本佔領期，印尼與日本合作時，檯面上和日本人合作的是蘇卡諾，暗地利用機會準備獨立的計劃，即有受到陳馬六甲策略影響的說法。後來日本投降後，蘇卡諾不敢擅自做主宣佈獨立，一群青年人綁架了蘇卡諾，才有了 8 月 17 日的獨立宣言，這個青年組織也和陳馬六甲有關係。印尼獨立革命期間，他甚至一度被認為如在蘇卡諾及哈達被捕後即繼續領導獨立革命的繼任領袖。³⁴⁵但是其事蹟一直隱密不彰，因為他早在 1920 年就成為印尼共產黨主

³⁴² 見 Benedict Anderson, *The Pemuda Revolution: Indonesian Politics, 1945-1946*. Ph.D. Thesis in Cornell University, 1967, p. 460.

³⁴³ Yamin 在印尼獨立革命時即出版文章推崇陳馬六甲的貢獻，見 Muhammad Yamin, *Tan Malacca: Bapak Republik Indonesia*. [陳馬六甲；印尼共和國之父] Djakarta: Berita Indonesia, 1946, pp. 2-5. 印尼獨立後多年，Yamin 成為歷史學家，仍然肯定陳馬六甲的成就，後來在八十年代又結集文章重新出版，見 Muhammad Yamin, *Tan Malaka: Bapak Republik Indonesia*. Jakarta: Yayasan Massa, 1981, p. 12.

³⁴⁴ 陳馬六甲率先提倡成立共和國，主要文獻是 Tan Malacca, *Naar de 'Republiek Indonesia'*, 1925. 當時這篇文獻在東京、馬尼拉、廣州及新加坡都有出版，並譯成不同語文。

³⁴⁵ Anthony Reid, *Indonesian National Revolution, 1945-50*. Hawthorn: Longman, 1974, p. 72.

席，³⁴⁶該黨在印尼獨立前被荷蘭和日本當局強力的壓迫，獨立後又先後被蘇卡諾及蘇哈托壓制清算，而陳馬六甲本人在印尼革命時死於內戰，陳馬六甲的相關事蹟，例如其在印尼革命中的角色，仍是尚待探索的課題。

由於陳馬六甲的特殊背景，印尼官方過去並沒有承認其在歷史上的地位，³⁴⁷官方控制下的教育對印尼歷史的解釋一直是以蘇卡諾及蘇哈托的當權派歷史為主軸。近年來國際學術界不斷地發掘陳馬六甲的新材料，重新加以研究及詮釋，其神祕的事蹟才逐漸為人所知曉，也漸為印尼各界接受而承認其地位。³⁴⁸日前印度尼西亞的周刊雜誌選出了二十世紀印尼代表人物，印尼國內兩家

³⁴⁶ 陳馬六甲是在 1917 年開始參加社會主義運動，當時正是印尼成立社會主義思想社之時，而印尼共產黨成立於 1920 年，早期的重要成員，如 Semaun (1899-1971), Alimin Prawirodirjo (1889-1964), Musso (1897-1948), Darsono (1897-) 及 Tan Malaka (1897-1949) 當時都還很年輕，其中陳馬六甲因為長於理論而成為領袖。共產黨在當時仍為荷屬東印度的印尼，很快地就為荷蘭總督政府鎮壓，陳馬六甲在 1922 年為荷蘭殖民政府。Finngeir Hiorth, "Indonesie: Geruchten van Atheïsme." [印尼：無神論的思想] *De Vrije Gedachte*, 3, 1997. [自由思潮雜誌]

³⁴⁷ 只有曾經在蘇卡諾總統 1963 年的 53 號命令中承認陳馬六甲為獨立革命英雄，但是在其他各種紀念開國英雄的場合，基本上沒有陳馬六甲的位置，是被有意識地排除在公眾記憶之外，因此在印尼青年一輩也對陳馬六甲其人一無所知。但是蘇哈托下台以後，陳馬六甲的著作開始有重印出版的現象，估計未來情況可能會改變。見 Komunitas Bambu ed. Tan Malaka, *Islam Dalam Tinjauan Madilog*. Jakarta: Komunitas Bambu, 1999.

³⁴⁸ 專門研究印尼歷史與印尼民族主義的 Benedict Anderson 日前在印尼演講時，表明了陳馬六甲是和蘇卡諾(Soekarno)與哈達(Hatta)並稱的印尼開國歷史上的大人物。見"Prof Ben Anderson: Bangsa Indonesia Terjebak dalam Premanisme Politik" [安德生教授：印尼民族進入平民政治] *Surabaya Post*, Kamis, 04 Maret 1999.

重要的雜誌社 *Tempo* 及 *Forum* 分別選出 50 名及 100 名二十世紀印尼代表人物，兩份名單中都有陳馬六甲的名字，顯示其在印尼歷史的地位也在其國內被認可。

另一個經常被詢及的問題是陳馬六甲是不是華人，日前東南亞的一些華文報紙及台灣的幾家報紙以「印尼百年名人 14 位華人上榜」為題做報導，把陳馬六甲當成華人而算在其中，成為歷史政治類的華人代表。³⁴⁹這顯然是錯誤的，雖然東南亞華裔移民歷史悠久，許多和當地人結婚，以致誰是華裔變得難以考證，然而陳馬六甲如假包換，是蘇門答臘的米南加保人，和華裔沒有任何血緣關係。造成這個錯誤的原因，很明顯是由於其中文翻譯，*Tan Malaka* 的中文翻譯「陳馬六甲」，早在四十年代已經出現，算是約定俗成的譯法，然而 *Tan* 不是中文的陳姓，而是當地人的名字。³⁵⁰陳馬六甲在其傳記中也特別表示其和華人沒有任何血緣關係，而其成長的環境也缺乏和華人接觸的經驗。陳馬六甲後來和

³⁴⁹ 這則新聞是 2000 年 1 月 10 日由中央社發自新加坡的報導，台灣的報紙如聯合報等刊登了這則消息，東南亞華文報如星洲日報等，刊登了同樣的消息，經筆者查證其印尼文雜誌出處，其中並沒有特別指稱誰是華裔，因此把印尼革命英雄當成華人，應為中文報刊自行認定。現在這項錯誤已在華文世界流傳，如僑訊 1131 期報導(2000 年 2 月)，〈印尼百年發展百位代表人物，華裔佔十四名〉，同樣將陳馬六甲當成華人，視為華人之光。

³⁵⁰ 印尼革命時期(1945-1949)，有關印尼的報導大量出現在東南亞的華文報紙，當時即以「陳馬六甲」的譯名出現在華文報紙上，所以將 *Tan* 譯為姓「陳」，則是因為東南亞福建人的人數較多，而陳姓為大姓，以福建話發音譯其姓為 *Tan* 到處可見，於是早期翻譯的人將之譯為陳姓。後人反而以此認定其為華人，則是謬誤大矣。

華人的交往與緣份，和其出身並沒有什麼關係。

旅者雖是非凡人物，但在他們臨時闖入異域時卻是以普通人的身份，他們在異域時都停留在偏遠的鄉間，為了安全上的理由，他們都隱姓埋名，郁達夫成了趙廉，知名文學家成為本地商人，而陳馬六甲成為陳和森，革命家卻成為歸鄉華僑，他們都以平民百姓的身份和本地人的交往。而從記錄中我們也看到他們的越境交流經驗主要都是和小人物打交道，因此他們和本地人的交往應該以平民視之，而非代表在另一文化體系中的知名人物，因此其旅程也該視為民眾的交流經驗。民眾交流與國際交流意義不同，少了對現實政治及權勢利益的考慮，多了基於人性的關照與友情。

跨境之旅的可能意義

旅行是旅者肉體上離開慣居之地而行經陌生之地的過程，是肉身與陌生環境互動的經驗歷程，而這種經歷會使旅者產生精神上的特殊狀態。對旅行的意義也有兩方面重點強調，一則是強調自己的肉身經驗；一則是強調陌生環境，前者多是探險犯難的起伏歷程，後者則為異域世界的探索接觸。強調肉身經驗者，舉凡擺脫慣常生活的新鮮感、旅途所帶來的困頓、旅程中的不定感與危險性等，是形成旅行做為特殊人生經驗的重點。例如在《西遊記》中唐三藏的旅行，記述的重點是對肉身造成危險威脅的經驗，

而非火焰山或是西天的風土人情如何。而強調陌生環境，則經過親身體驗的陌生事物，就成為旅行經驗的重點，甚至在特殊的歷史時空，特定的旅行則可能成為文化接觸的見證，例如《馬可波羅東遊記》中，雖然馬可波羅親身的經驗奇特，但是記述的重點不在馬可波羅親身經驗本身，更有意義的是由其親身體驗的中土事物，因而留下在中西文化交流上的重要紀錄。

從這個角度來看郁達夫的蘇門答臘之旅，以及陳馬六甲的中國之旅，則都是兩重意義兼而有之。郁達夫在新加坡被日軍攻陷之前，身為新加坡「文化界戰時工作團」團長，在陳嘉庚的安排下隨著 30 幾位新加坡工作的「文化人」（作家與報紙編輯等），逃到地廣人稀的蘇門答臘島，為了身家性命，隱姓埋名，喬裝為本地商人，卻因為通曉日語，被駐守當地日軍徵調為通譯，並掩護其他一起逃難的文化工作者，郁達夫這個旅程本身已經是足夠刺激玄奇。然而這個旅程也對蘇門答臘這個環境有特別的意義，在此之前中文世界對蘇門答臘基本上沒有什麼特殊的記錄，郁達夫連同其他作家的蘇門答臘之旅，留下大量的記錄，連帶對蘇島的各種情況，包括對蘇島的華人社會的情況，也一併留下了彌足珍貴的記錄。

陳馬六甲的中國之旅也是一樣，他是在莫斯科國際共產黨會

議上為各亞洲共產黨的代表，³⁵¹印尼早期的革命領袖，以及印尼共產黨草創時期的主席，³⁵²由於二十年代的革命失敗而流亡海外，以避免列強殖民政府的追捕，其間幾度入獄又幾度逃脫，流亡路線遍及亞洲諸國，最後卻選擇中國為其棲身之處，化身華僑，隱藏在各地不同的華人世界。就其個人經驗而言，逃亡過程的驚險曲折，有其引人入勝之處；就其所經之處，對當地情況的記述也有特殊的價值。他以社會革命家的眼光觀察中國南方社會，從政治社會結構的理解到華南農村的風俗習慣，以印尼／馬來語文紀錄了第一手的接觸經驗，其理解深入的程度，到目前的印尼／馬來文文學中還未有出其右者。這個接觸經驗從東南亞缺乏溝通華人世界與土著世界的英雄類型來看，的確是難能可貴的經驗。

陳馬六甲的華南之旅主要是發生在三十年代，而郁達夫的蘇門答臘之旅則是發生在四十年代，在人類旅行史上是個中間時期，探索無人之地的冒險家或航海家時代早已經過去，而大眾旅

³⁵¹ 1922年陳馬六甲赴莫斯科第四屆國際共產黨會議(Fourth Congress of the Comintern)，陳馬六甲被選為東方組的主席(Eastern Commission Comintern)，是亞洲地區共產黨人的代表，這使得陳馬六甲一開始流亡生活就具有很高的國際知名度，其後消聲匿跡甚久，增添其神秘色彩。Harry Poeze, *Tan Malaka: Strijder voor Indonesie's Vrijheid, Levensloop van 1896 tot 1945*. [陳馬六甲：印尼自由的鬥士，1896年到1945年的一生] Gravenhage: Martinus Nijhoff, 1976. pp. 231-232.

³⁵² 目前在印尼出現的文獻中，傾向將陳馬六甲視為社會主義者的代表人物，而其出身印尼共產黨的身份則未被強調，這可能是因為其在印尼的時間很短，而以共產黨員出現是在1922年以前的事，因此只將之視為社會主義者。相關討論請見 Y. B. Mangunwijaya, "Sosialisme Indonesia." [印尼的社會主義] *Kompas*. Kamis, 14 November 1996.

行則尚未崛起，至少在亞洲是如此，十九世紀末期當日本明治維新之後，還有日本人試圖在太平洋地區尋找無人之島，希望得以建立新殖民地，到了二十世紀初期則完全放棄這種念頭，而到了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儘管亞洲各埠之間都有固定航線往返，但是能有機會到到異國旅行，還不是很容易的事。而其中困難的程度，除了交通及經費上的問題以外，主要是文化上的差異所構成的心理障礙，這可以從同一時期與南洋有關的遊記中清楚看出。³⁵³

旅行的類型

旅行有不同的類型，可以是自願的或是被迫的，或是有特殊任務，可以是個人的也可以是集體的，因此旅遊、隱居、放逐、逃難、出征、傳教、養病或是執行勤務，都是不同的旅行經驗。我們對旅行採取不同的分類，是希望能對旅行的性質加以掌握，如果既有的類別中沒有合適的分類，則應該加以尋求或創造合適的類別。這些不同的類型都涉及旅行者離開自己熟悉的地方而進

³⁵³ 例如做為出版社代表的鄭健盧，為了編南洋合用的教科書，才有機會走訪南洋各埠，因此特別將其旅程及所聽聞之各地風土記錄下來，見鄭健盧，《南洋三月記》。香港：中華書局，1933年。而專門研究僑鄉的社會學家陳達，因為得到美國基金會的協助，才有機會訪問南洋各僑社，也珍惜一路見聞而出版其旅行筆記，見陳達，《浪跡十年》。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年。而艾蕪因其流浪經驗而寫下南洋情狀，也是基於時人對南洋隔閡，發而為文而成，見艾蕪，《南行記》。上海：生活書局，1935年。這些遊記的產生都一方面顯示當時赴南洋旅遊不易，另一方面也表明了當時普遍對南洋風土文化的陌生感。

入陌生環境而形成精神上的特殊狀態，這種特殊的精神狀態只在旅行中存在，常常是旅行者追求旅行經驗的原因，也常常是旅行文學創作的泉源。

依照一般的分類，陳馬六甲和郁達夫的旅程性質應屬出走或是流亡，陳馬六甲是革命失敗被荷蘭東印度當局放逐，而郁達夫則是為了逃避日軍的追捕，假如沒有這種特別的機緣，兩位主角未必會有這樣的異域探險，這是有偶然性在其中。不過流亡包含被迫離開慣居之地，漂流異鄉，和主動求取探索異地並不相同，由此，郁達夫和陳馬六甲的旅行狀態不能單以流亡視之，他們也都有想要探索新世界的念頭，才有了他們的旅行，假如不是有探索異域的心，他們都可以選擇很快地離開這個原本不屬於他們心靈世界的異域。然而兩者皆由於對異域接觸有特殊興趣，他們不約而同地闖入了一個屬於介於華人和印尼／馬來人之間的世界。

陳馬六甲為什麼會到華南去呢？以其革命家的行徑，他沒有任何好的理由要到華南，特別是到福建省的鄉間名不見經傳的小鎮上。陳馬六甲曾經想在印尼鄰近國家的都會地區活動，所以其主要的根據地，是曼谷、新加坡、馬尼拉及仰光等地³⁵⁴，中國對陳馬六甲而言，仍是太遙遠的國度。雖然陳馬六甲在 1924 年曾經

³⁵⁴ 1924 年他考慮在鄰近的熱帶國家活動，提到了暹羅、緬甸、安南、菲律賓和馬來亞，而他到廣洲時，有嚴重水土不服的現象，在當地工作一位德國醫師表示，他必須停留在熱帶國家對其健康比較好。Tan Malaka, *Dari Pendjara ke Pandjara*. 1948, Vol. I. pp. 120.

去過廣州，他發現廣州也並非理想的革命據點，³⁵⁵後來因為被香港的英國殖民政府及菲律賓的美國政府追捕，在放逐過程中得到協助而到了廈門。陳馬六甲的華南之旅始於偶然，他也沒有很好的理由要停留廈門，³⁵⁶假如他打算離開廈門，也是不難安排的事情，他卻決定留在華南地區，並且移居更內陸的農村，理由除了找個安靜的地方養病以外，他自己也表示他一直希望能夠有機會能好好地觀察瞭解中國農村。如果不是陳馬六甲對中國的興趣，也不會有這段旅程，這和流亡心態不相同，不能只以流亡視之。

郁達夫也是一樣，郁達夫逃抵蘇門答臘實屬偶然，但是同一個時間選擇這一逃亡路線的，都有其他方式逃離，如日後主持盟軍和中國聯合抗日的情報部隊「一三六部隊」的林謀盛，³⁵⁷則是在蘇門答臘的巴東搭船到澳洲，繞道回到重慶；而當時和郁達夫

³⁵⁵ 那是因為在開完莫斯科國際共產黨會議之後，希望讓陳馬六甲拓展亞洲方面的宣傳聯繫工作，他便選定廣州為其工作地點，後來發現，即使廣州是吸收外來事務最快的地方，但是光是印刷拉丁字母的困難，就足以使他計劃出版英語的革命宣傳刊物 *The Dawn* 的計劃落空，他在其自傳中以一個章節的篇幅提到了各種困難，。Tan Malaka, *Dari Pendjara ke Pandjara*, 1948, Vol. I. pp. 122.

³⁵⁶ 1927 年的華南已經和幾年前的廣州成為國際左派聚集地的情況大不相同，經過國民黨清黨之後，情況丕變，由反共的中國國民黨控制政局，如果國民政府知道印尼共產黨頭號人物在中國，必定會採取行動，因此廣州不再是可以容納國際共產主義分子的地方。

³⁵⁷ 林謀盛為戰前新加坡「星華僑抗敵動員委員會勞工服務部」主任，逃到重慶之後受命領導「一三六部隊」，進行情報工作，後來不幸殉職。相關事蹟見莊惠泉編，《新馬華人抗日史料》。新加坡：文史出版有限公司，1984 年。陳崇智，《我與一三六部隊》。新加坡：海天書局，1994 年。

一起逃難的王紀元，³⁵⁸則由蘇門答臘逃到爪哇島，和陳嘉庚一樣就在爪哇島隱居，³⁵⁹在整個日本佔領時期，身份完全沒有曝光。比較其他文人在南洋的日本佔領時期的低調及隱藏自己，則郁達夫這段彷彿雙面間諜的角色扮演，是在其不掩飾自己會說日語的必然結果，其實是毫無必要，這多少和郁達夫的性格有關，一邊隱藏身份逃難，一邊還要學習新語言、買書及吟詩，要以流亡心態來評價郁達夫的最後的人生旅程也有很大的困難。

綜觀陳馬六甲與郁達夫的旅程，如果我們以被迫旅居異域看成是流亡，那麼流亡只是造成他們旅程的契機，而吸引他們繼續深入異地，則是其對於異境的興趣，從這點來看也和異域探險的旅行並無二致，整個過程固然是一直在動態的情況中，但是也都一度在當地營生，設法定居一段時間，都是在隨遇而安式的旅居狀態。他們的旅程可以說是以流亡為契機，以異域探險為動力，而以設法在當地營生的旅居為狀態。

比較理想的描述兩者的旅程是印尼文的 *rantau*，³⁶⁰做為名詞的

³⁵⁸ 王紀元原為國際新聞社重慶辦事處主任，1940年應南洋商報之邀到新加坡工作，太平洋戰爭時逃到爪哇島，戰後在雅加達辦報。見王紀元，《我與三聯》。香港：三聯書局，1978年。

³⁵⁹ 陳嘉庚為新加坡商人，為當時南洋華人領袖，太平洋戰爭時期逃到爪哇島的瑪琅(Malang)避居，未被日軍查獲。見陳嘉庚，《南僑回憶錄》。新加坡：南洋印刷社，1946年。

³⁶⁰ 印尼文詞彙用來表示流亡或放逐則是 *perasingan*，而 *rantau* 源自米南加保語，是指離開家鄉到外地旅居生活，Rudolf Mrazek 便認為以 *rantau* 來描述是比較為合適。見 Rudolf Mrazek, "Tan Malaka: A Politicalm Personity's Structure

rantau 原意是異土，但是做為動詞字根的 *rantau*，是在異地生活，是隨遇而安式的流浪旅居，則兼有在異國流浪漫遊及赴異地工作謀生的意義，可以同時包含流亡及旅居等不同情況，因此在印尼文獻中對陳馬六甲的海外生活，多以 *rantau* 來描述，而對照郁達夫的旅程，郁達夫走到西部蘇門答臘的小鎮，然後才決定安頓在當地，*rantau* 也是十分貼切的說法，在華文南洋文學中艾蕪的《南行記》，以及華文臺灣文學中吳濁流的《南京雜感》，其中所描述的旅途，都是相當符合 *rantau* 的狀況。現代亞洲各國不乏有這種到異地營生而隨遇而安式的旅居生活情況，也許我們應該發展關於這種旅居經驗的理解架構。在本文中為求符合華文習慣，仍暫時用流亡來形容，但期待有更貼切的概念出現。

特殊時空的旅程

郁達夫在蘇門答臘的旅程是在 1942 年 2 月 4 日拂曉逃離新加坡，當天下午到達荷屬外島，此時距離新加坡在 2 月 15 日晚上被日軍攻陷，只早了十幾天，自此郁達夫就在蘇門答臘渡過整個太平洋戰爭時期，再也沒有離開過蘇門答臘。而其逃亡路線是由和一班文人一同到卡里汶島(karimun)，經石叻班讓(Selat Panjang)、望嘉麗(Bengalis)、實保東(Sepotong)，每個地方各停留幾天，而

of Experience.” *Indonesia* 14, October 1972.

郁達夫也在各地都有詩文留下。郁達夫在實保東時已經開始找書和當地人學印尼語。然後郁達夫和王紀元兩人一起走，先到一地住下來，不久又決定再往南走，到了蘇島中部的巴干峇魯(Pekanbaru)，最後到達巴爺公務(Payakumbuh, 舊稱 Bajakoem Boeh)定居下來。日後雖然有一段時間到了巴東(Padang)，打算在當地開日語補習學校，也曾到日軍總部武吉丁宜(Bukit Tinggi)擔任通譯，或是因公務出差到亞齊(Aceh)，但是始終是以巴爺公務為居所，最後也死在巴爺公務。

巴爺公務是西部蘇門答臘的一個高原市鎮，人口約有 5000 人，交通並不十分便利，是幽靜的山城。³⁶¹郁達夫在蘇門答臘化名趙廉，扮成本地商人模樣，然而在由巴干峇魯到巴爺公務的路上，所乘的巴士碰到問路的日本軍車，巴士上的司機和乘客都不瞭解日語，化名趙廉使用日語作答，解除語言不通的困境，也因此暴露了會說日語的能力，後來被日本憲兵隊徵召為通譯。同一時間，和郁達夫一起逃亡的文人便合開了一家酒廠，由趙廉當名義上的老闆，名為趙餘記酒廠，而實際的經營工作則由張楚琨負責，其他文人如胡愈之、邵宗漢、沈茲九、汪金丁等人都在酒廠裡幫忙。

³⁶¹ 巴爺公務所在地的主要族群是米南加保人，而陳馬六甲正是出身米南加保。算起來陳馬六甲和郁達夫是互訪對方故居。關於米南加保人的族群特性及文化，見 Edwin M. Loeb, *Sumatra: Its History and People*.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1935]. pp. 97-127.

剛開始擔任翻譯時，因為郁達夫喬裝本地商人，不得不假裝會當地語言，從有限的印尼語開始，慢慢地學會了印尼語與荷蘭語。由於他成為當地能溝通日軍、印尼人、荷蘭人與華僑的通譯，因此幫了許多人忙，例如在審訊印尼人時，有意地替他們減輕罪證，而開脫過不少的印尼人。與郁達夫一起逃亡到蘇門答臘的作家張楚琨，記述了郁達夫曾經幫印尼共產黨一個大忙，有一次日本人破獲了印尼共產黨的一個機關，證據卻只搜到一份捐款人名單，如果被日本憲兵知道，牽連太廣，而郁達夫則譯為放高利貸名單，守在機關的老人只被打了幾個耳光。³⁶²郁達夫也設法為華僑開脫，在郁達夫擔任通譯的期間中，武吉丁宜（Bukit Tinggi）的憲兵隊不曾殺過一個華人。由於許多人在戰後記述了郁達夫的情況，即使郁達夫曾經為日軍工作，倒是沒有人將郁達夫當做漢奸看待。³⁶³郁達夫窮困一生，到了蘇門答臘才有機會成為老闆，常常在周旋在日本憲兵、華僑、印尼人和荷蘭人之間。後來郁達夫在當地娶妻生子，對象是當地的土生華人，不諳華語，他們以

³⁶² 張楚琨，〈憶流亡中的郁達夫〉。《回憶郁達夫》，陳子善、王自立編，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年。

³⁶³ 蘇門答臘這個舞台和新加坡大不相同，和新加坡在日本占領時期的血腥恐懼相比，日治時期的蘇島是一片昇平，這主要是日軍來到蘇門答臘時，戰爭已經結束了，主要工作是統治而非戰鬥，因此華人社會的反應就和新加坡大異其趣。蘇島的華人和日本人並沒有深仇大恨，對華人而言，只是換了當權者而已，當地華人社會並不以和日本人合作為恥，這種情況在描述當時蘇島情況的文字記載中可以看出。因此像郁達夫為敵人工作，也不致於不見容於華人社會，這是和當地社會互動的結果。

印尼語溝通，生有一子一女。

郁達夫的失蹤或死亡是旅行故事的高潮，多少年來對郁達夫的回憶文字都表達了對郁達夫生死之謎的關注。郁達夫的失蹤發生在戰爭結束以後兩週，正是他的繼任夫人第二次生產的前一天晚上失蹤的，失蹤當晚郁達夫家中還有幾個客人，一位青年來找郁達夫，該青年「像一個台灣人，也像一個印尼人」，隨後郁達夫和那人一起出門，從此再也沒有回來。³⁶⁴日後各方面的猜測與研究，則幾種可能性都分別出現，有認為是印尼人殺害的，有認為是被當地華僑殺害的，也有認為是被日本憲兵殺害，但是都沒有確實的證據，這個謎直到 1995 年才為長期從事郁達夫研究的日本學者鈴木正夫解開。³⁶⁵

陳馬六甲是在 1922 年因為印尼革命失敗，被荷蘭當局逮捕並監禁，坐了荷蘭的監牢，最後荷蘭當局將他流放到荷蘭。對於一生矢志革命的陳馬六甲而言，離開了自己的國土則失去了革命的根據地，於是他從歐洲經過俄國，參加莫斯科國際共產黨會議，會中他成為亞洲共產黨人的代表，然後回到亞洲，積極地保持和其幹部聯絡，一方面為印尼革命奔走，另一方面也為亞洲各地共

³⁶⁴ 對於郁達夫失蹤事件的報導，以胡愈之的《郁達夫的流亡和失蹤》最為詳細，也最早出版，因此後來的文字記錄多半以胡愈之的記述為藍本。見胡愈之，《郁達夫的流亡和失蹤》。香港咫園出版社，1946 年。

³⁶⁵ 鈴木正夫(Suzuki Masao)《スマトラの郁達夫：太平洋戦争と中国作家》。東京：東方書店，1995 年。

產黨的發展而努力。³⁶⁶於 1924 年前往廣州發展，後來決定離開廣州而在 1925 年到菲律賓，開始以菲律賓為據點，這段時間他化身為菲律賓人 Ossario，一方面為當地英文報刊寫文章，另一方面展開他的革命事業，卻在菲律賓被人密報，1927 年為當時統治菲律賓的美國政府逮捕，進入美國的監獄，最後美國當局決定將他驅逐，卻在驅逐的過程中，被同情他的船長掩護，讓他在廈門的鼓浪嶼逃走。於是他在一無所有的情況下，忽然置身一個閩南語的世界，³⁶⁷從此進入了避居華南的旅程。

他首先跟著一位同船的乘客 Ki-Koq(福建話為「發瘋」之意)到他在福建的鄉下村莊 Sionching 住上 5 年時間，³⁶⁸這是一個只有幾百人居住的陳氏單姓村，在此陳馬六甲和一般村民交往。Ki-Koq 是來自北呂宋(Luzon)碧甘(Bigan)的菲律賓人，父母親因參加菲律賓革命而雙亡，他為當地華人所收養，後來被送到福建鄉間長大。

³⁶⁶ 關於陳馬六甲早年參與革命的經驗，最詳細的研究請見 Harry Poeze, *Tan Malaka: Strijder voor Indonesie's Vrijheid, Levensloop van 1896 tot 1945*. Gravenhage: Martinus Nijhoff, 1976, pp. 213-312.

³⁶⁷ 他在自傳中表示，當他剛到鼓浪嶼，對閩南語是一個字也聽不懂，無法和當地居民溝通，只在船上有認得兩位的菲律賓華僑，可以用英語溝通。Tan Malaka, *Dari Pendjara ke Pandjara*, 1948, Vol. I. p. 173.

³⁶⁸ 陳馬六甲在其自傳中，用了大量的福建話的詞彙，以拼音的方式表達，然而陳馬六甲的拼音方式受到馬來語及各種歐洲語言的影響，用法和一般人不相同，且在各處的用法也不很一致，因此在這裡採取以下的做法，如果能因其意義而推估中文意義者，儘量予以註明，並依其上下文強調重點決定以拼音優先或是中文譯音優先，註明部分則放在括號之中，但如果是地名，在未找到確定的中文地名以前，只用拼音，以免造成後人混淆。這一部分的記錄主要是出現在其自傳的第一冊後半部及第二冊，即 Tan Malaka, *Dari Pendjara ke Pandjara*. 1948, Vol. I. & II.

Ki-Koq 崇拜革命英雄，經常在喝酒(chiak-chiu)之後，在鄉間田裡發飆並開槍射擊，被村民視為異類。當陳馬六甲到了舉目無親的福建，Ki-Koq 建議他避居鄉間，而邀請他到自己的鄉村去，陳馬六甲欣然同意，他在其自傳表示，研究中國社會情況不能不瞭解中國農村，他早想到中國村莊以瞭解中國的社會條件。³⁶⁹然後就在這個小鎮住下來，在當地渡過了將近五年的時間。

1932 年他去了上海，主要似乎是為了在上海利用關係取得護照，在他的自傳中，由於當時上海的複雜情勢，讓陳馬六甲寫下他對中國近現代史的觀察，如中國與列強的關係，中國的社會結構，以及上海的複雜情勢，如租界，秘密會社，杜月笙，國民黨人，宋氏家族，日本浪人，工潮等。最後他終於取得了護照，得到了個中文名字 Ong Soong Lee，然後以華人身份出現。取得護照後隨即前往香港，未料立刻為香港警察所逮捕，於是進了大不列顛帝國的監獄。原本他計劃再到菲律賓重建革命基地，或是到歐洲取得國際奧援，然而再一次事與願違，陳馬六甲在無任何外援的情況下，再次被港英政府送回上海。

從香港到上海的途中，當船停留在廈門時，陳馬六甲再一次逃脫。這一次距離他上次從廈門逃脫是五年時間，和上一次不同的是，這次他熟門熟路，先到廈門市找他的舊友嘉義(Ka-it)，很快地又避到福建的鄉間，嘉義(Ka-it)的鄉下村落 Iwe。顯然地，這一

³⁶⁹ Tan Malaka, *Dari Penjara ke Pandjara*. 1948, Vol. I. pp. 173.

次再到福建的鄉間，生活適應已經不成問題，語言也不成問題，他自由自在地和不同身份的村民打交道，並且在其自傳中，用大量的福建話的詞彙記述當地的情況，如由於土匪(to-hui)當道，收成不好，糧食不足，他和當地人一樣，只是「吃蕃薯配豆豉醬」(chiak han-chu pe tau-si)，又如他去看中醫時，「身體發熱」(singku shin diot)，而「醫生」(sensei)則以為其身體虛寒，必須「吃補」(chiak poo)等等。他都以印尼人讀者為對象，仔細介紹華南生活的情景，並且和印尼的觀念或生活情況互相對照。

他也用福建話的詞彙記錄了他對當地日常生活的觀察，如參與村中喜宴葬禮等情況，談到「媒人」(milang)的角色與當地重男輕女的觀念，而有「查甫仔我們家的，查某仔別人家的」(ta-po kian lan e, cha-bo kian palang e)的說法等。³⁷⁰也記錄了當地人的風水(hong shui)觀念與祖先崇拜，社會變遷對年輕一代婚姻與戀愛觀念的影響，他也特別注意到女性在家族中的角色，年輕的女性和年長的女性在家族中的不同地位。和他密切交往的，都是一些小人物，由於所住的地方是僑鄉，也有些是住過不同地方的歸僑。

除了村中生活以外，他也開始在陳嘉庚的故鄉集美開始教書，教授英語，到了 1936 年他甚至在廈門開辦了一所外語學校(School for Foreign Languages)，有中學生及大學生來學習外語，以

³⁷⁰ Tan Malaka, *Dari Pendjara ke Pandjara*. 1948, Vol. I. pp. 198.

英語為主，也有學習德語的，其中也有不少華僑子弟，由於當時社會情勢使然，學生們熱衷國事，也有對社會主義有興趣者，他和部分學生在思想上有很多交流。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日軍前來福建，陳馬六甲只好選擇離開。從 1927 年到 1937 年，陳馬六甲總共在華南地區住了十年，他甚至曾經歸化成為中國國籍。³⁷¹

陳馬六甲的華南之旅到了 1937 年已經結束，但是他和華人社會的因緣未了，離開廈門以後，陳馬六甲在東南亞幾個都市旅行，從仰光，柔佛，馬六甲到新加坡，他發現在華人社群中生活反而比在馬來人社群中生活安全，他不用擔心被出賣，他懂得華人語言與習慣，他還有中國的護照，於是最後他定居在新加坡的華人社區之中，當時他化身為菲律賓華僑，用「陳和森」為其化名，然後在陳嘉庚所創立的南僑師範學院擔任英語教師。³⁷²到了 1942 年當日軍攻佔新加坡前夕，他認為時機來了，於是離開新加坡而潛入印尼，這一次，以革命為職志的陳馬六甲，在另一次印尼革命的契機中回到了印尼。綜觀其二十年的海外生活，有整十年在

³⁷¹ 那時陳馬六甲為了取得身份，以避開當時受到日本勢力範圍影響的福建省政府的干擾，由其好友嘉義(Ka-it)出面請福州政府高級官員協助，以收養為家族成員的方式，歸化為中國國籍，陳馬六甲認為他和協助他的人主要是為了亞洲和革命(Kek Bing)的理由而促成此事，自傳中未再做進一步的說明。Tan Malaka, *Dari Pendjara ke Pandjara*, 1948, Vol II, pp. 76-78.

³⁷² 王任叔也曾在新加坡南僑師範學院任教，和陳馬六甲是同事，王任叔後來在蘇門答臘時已經知道陳馬六甲就是其昔日同事陳和森，已經潛回印尼開始活動，於是試圖和他接觸，但是沒有結果。見王任叔，《印度尼西亞近代史》。周南京整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第 902 頁。

華南渡過，而有另外五年是在新加坡的華人社群中渡過，最後終於在印尼革命的關鍵時刻回到印尼。

旅行文學的形式

郁達夫與陳馬六甲的有關記錄都引起旅行文藝的形式問題。郁達夫的南洋之旅，尤其是在蘇門答臘的一段歷程，在戰後五十年來已經成為不同華人社會不斷回憶的軼事，就形式而言，是由共同回憶集體創作集合而成。每隔一段時間，就有關於郁達夫的追憶文章出現，文章分別出現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台灣、香港及中國大陸等有華文寫作傳統的地方，1995年日本學者鈴木正夫(Masao Suzuki)出版了長期對郁達夫的蘇島之旅的研究，隨後即有人宣佈要將郁達夫的故事拍成電影。郁達夫的蘇島之旅已成為華文世界的共同記憶，在華文文藝上留下特別的記錄。

在這些散佈在各地有關郁達夫蘇島之旅的文章，可以分為幾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核心的記錄文字，由和郁達夫一同避難的文化人所寫，多是在戰後早期即書寫出版，主要的是胡愈之的「郁達夫的流亡和失蹤」³⁷³、巴人的「記郁達夫」³⁷⁴、金丁的「郁達

³⁷³ 胡愈之，《郁達夫的流亡和失蹤》。香港咫園出版社，1946年。

³⁷⁴ 巴人，〈記郁達夫〉。《人間世》，3(3)，1947年。

夫的最後」³⁷⁵、張楚琨的「憶流亡中的郁達夫」³⁷⁶、李鐵民的「西行之始」³⁷⁷、吳柳斯的「紀念郁達夫先生」³⁷⁸以及沈茲九的「流亡在赤道線上」³⁷⁹等。第二個部分是由和郁達夫最後旅程短暫接觸或者有關係的人所執筆，試圖提供不同的線索，例如柔密歐鄭(鄭遠安)的「郁達夫在望嘉麗」³⁸⁰，胡浪漫(胡邁)的「緬懷郁達夫先生」³⁸¹，了娜(張紫微)的「郁達夫流亡外記」³⁸²等等，許多文章到了七十年代及八十年代仍方興未艾。第三部分主要是文藝研究者所寫的文章，很多作者與郁達夫無直接關係，如臺灣的劉心皇³⁸³、日本的鈴木正夫³⁸⁴、中國的陳子善³⁸⁵、新加坡的方修³⁸⁶等人，都致力郁達夫在南洋的資料收集、考證及研判。一直到九十年代仍有關於郁達夫的文章不斷出版，在他過世半個世紀之後，仍不斷

³⁷⁵ 金丁，〈郁達夫的最後〉。《文藝生活》，13:3，1949年。

³⁷⁶ 張楚琨，〈憶流亡中的郁達夫〉。《回憶郁達夫》，陳子善、王自立編，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年。

³⁷⁷ 李鐵民，〈西行之始——紀念亡友郁達夫死難兩周年之作〉。《南洋商報》，1947年。

³⁷⁸ 吳柳斯，〈紀念郁達夫先生〉。《回憶郁達夫》，陳子善、王自立編，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年。

³⁷⁹ 沈茲九，〈流亡在赤道線上〉。《風下》。新加坡，頁42-62，1946年。

³⁸⁰ 柔密歐鄭，〈郁達夫在望嘉麗〉。《當代文藝》。香港，80，1972年。

³⁸¹ 胡浪漫，〈緬懷郁達夫先生〉。《聯合早報》，1986年。

³⁸² 了娜，〈郁達夫流亡外記〉。《文潮》，3(4)，1947年。

³⁸³ 劉心皇，〈郁達夫與王映霞〉。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

³⁸⁴ 鈴木正夫(Suzuki Masao)，《スマトラの郁達夫：太平洋戦争と中国作家》。東京：東方書店，1995年。

³⁸⁵ 陳子善、王自立編，〈郁達夫研究資料〉。花城出版社，1986年。

³⁸⁶ 方修與張笏編，〈郁達夫研究資料〉。新加坡：萬里書局，1977年。方修編《郁達夫抗戰論文集》。新加坡：世界書局，1977年。

引起興趣，為各地華文文藝圈所關心，唯有郁達夫一人矣。

以上所述的各種不同的文字記錄構成郁達夫的旅行記錄，這樣的旅行記錄可以算是旅行文藝嗎？現在大眾對郁達夫的蘇島之旅的理解，主要都是出自他人之手筆，顯然地個別人士所知道的都只是郁達夫旅程的一個片斷，因此必須將這些文字集合拼湊起來才能一窺旅程全貌。旅行文藝當然不必一定由旅行的主角來執筆，舉例而言，今天我們對鄭和下西洋這一旅程的理解主要是透過其助手出版的文獻，如馬歡的《瀛涯勝覽》(1416)、費信的《星槎勝覽》(1434)而得知，也非出自鄭和本人手筆，也是由不同文獻集合構成。然而如郁達夫這樣一位提倡文學必須本於個人真實人生經驗的作家，在其人生一段最精彩的旅行之後，卻無法親自記錄其旅行，而在將要結束旅行時去世，自然是令人十分遺憾的事。相同的例子如航海家麥哲倫和庫克船長都是在旅行未結束前就身故了，但是他們本身至少都留下了詳細的記錄，足以做為旅程的基本文本，像郁達夫這樣能寫也應該寫的旅者，因為在日軍控制下無法進行寫作，情況是頗為特殊的，於是郁達夫的旅行記錄，便是由集體記載所構成。

陳馬六甲的旅行記錄在形式上也和傳統的遊記大不相同，其中國之旅是記錄在他的自傳《陳馬六甲：從監獄到監獄》(Tan Malaka, *Dari Penjara ke Penjara*) 之中的一部分，也是極為特殊的情況。這部自傳向來被認為是革命傳記，是亞洲早期共產黨人

中少有的詳實自傳，在三大冊洋洋灑灑的自傳中，陳馬六甲花了一冊的篇幅來記錄他的中國之旅，如果我們將其與各不同的華人社會的生活經驗加在一起，包括 1920 年代到廣州參加共產國際，20 年代末期在菲律賓和華人論交，以及 1937 年離開華南到新加坡在華人社群生活，全部的經驗算起來，都可證明在華人社群生活是其革命之旅中具有十足份量的部分，而且是難以分割的部分。現在問題是，一個作品的其中一部分可否成為旅行文藝的討論對象？就陳馬六甲的旅行記錄而言，其自傳中的一部分是目前有關其中國之旅的唯一記錄。

我們可以把一部革命傳記中一部分當成旅行文藝來看待嗎？如果可以的話，我們可以用同樣的方式對待其他的英雄事蹟嗎？許多英雄傳記都是一連串的地名組合起來的，卻難以令我們將其視為旅行文藝，那麼旅行文藝的要素是什麼呢？對於陳馬六甲這樣特殊的一生，二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兩度參加印尼革命，中間都是在海外流亡，其中絕大多數的流亡是在華南及南洋華社中渡過，將這段經驗存而不論是不公允的。如果我們將「從監獄到監獄」中有關華南／南洋華社的記錄單獨抽出來，成為一個清楚的旅行記錄，然而這又產生了新的問題，他的人生旅程其實是獻身革命的旅程，實則難以去除前後革命經驗而將華南／南洋之旅單獨抽出，因為他正是以一個革命家的精神狀態流亡各地，離開了革命家的身份，他的旅程也會褪色不少。因此就旅行文藝的形式

來看，陳馬六甲的華南／南洋之旅必須是其革命傳記的一部分，也是由於陳馬六甲特殊的一生經驗所致。

旅行文學的文類

郁達夫自己是否在蘇門答臘的旅行中留下未公諸於世的文字記錄，一直是被關注的重要問題。當初日本學者鈴木正夫為了研究郁達夫的旅程，三次親赴蘇門答臘走訪所有當時接觸過郁達夫的人，所抱持的信念即是尋找郁達夫可能留下的文字記錄。³⁸⁷然而現在所能找到的流亡蘇島的作品主要是郁達夫在的舊體詩，有一首五律贈給家住望嘉麗的鄭遠安，³⁸⁸兩首七言絕句贈送友人，以及十二首被題為《亂離雜詩》的七言律詩。³⁸⁹其他還有零零散散的詩詞幾首，其中最常被提及的是和在新加坡陷敵的老友胡邁隔海唱和的七言律詩，代表日治時期華人的網絡得以隔海傳詩；以及郁達夫在蘇門答臘結婚時所做的，代表郁達夫在蘇島居住後心情的轉折；也有從當時和郁達夫有直接接觸的日本人所記錄下

³⁸⁷ 鈴木正夫(Suzuki Masao)，《スマトラの郁達夫：太平洋戦争と中国作家》。東京：東方書店，1995年，頁16。

³⁸⁸ 日後鄭遠安以柔密歐鄭為筆名在印尼華文文學中佔一席之地，還不斷提及郁給他的鼓勵與感召。鄭遠安，〈郁達夫師在望嘉麗〉。陳子善、王自立編，《回憶郁達夫》。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年。

³⁸⁹ 原來在胡愈之的《郁達夫的流亡和失蹤》中附錄只有十一首，後來鈴木正夫又發現一首，故編成十二首，後來一併被收錄到《郁達夫全集》中。洪北江編，《郁達夫全集》。香港：大眾出版社，1961年。

來郁達夫所作的日文詩公諸於世。

這些舊體詩都是在隱姓埋名的情境下寫的，考慮在日軍統治下的情境，舊體詩是文人最安全的創作方式。郁達夫在蘇門答臘所寫的舊體詩，現在成了唯一可以瞭解郁達夫在這段時間心情的文字。和郁達夫自創造社開始即相知相熟的作家郭沫若表示，「讀了這四百餘首的詩詞，覺得我以前的看法還是對的，達夫的詩詞，實際上比他的小說和散文還要出色。」³⁹⁰而新加坡學者鄭子瑜則推崇郁達夫在蘇島的詩作：「《亂離雜詩》是郁達夫一生中最出色的詩作，用典適切，筆調清新，文筆與內容是同樣的出類拔萃。」³⁹¹同樣肯定了郁達夫詩作的價值。

這些留傳下來的舊體詩突顯了另一個旅行文學文類的問題，即舊體詩在中國現代文學發展以後的處境。舊體詩是旅行文學嗎？毫無疑問，是的。當郁達夫到達新加坡赴任星洲日報編輯時，當地文人邀請郁達夫分赴馬六甲及檳城旅遊，郁達夫或者自己在其遊記中作詩，或者在和當地文人相交往時以吟詩作詞互相唱和。這是當時文人出遊交往的方式，因此舊詩詞可以說是中文世界最主要的旅行文藝，當時文人以詩詞創作為主要的旅行文藝活動，其實涉及對旅行體驗的不同偏重。郁達夫所留下的詩詞表明了有別於西方旅行文類的文本存在，難以用同一標準來看待。除

³⁹⁰ 郭沫若，〈望遠鏡中看故人〉。《郁達夫詩詞抄》。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

³⁹¹ 鄭子瑜，〈郁達夫的南遊詩〉。《南洋學報》，12(1)，1956年。

了做為旅行文藝以外，舊體詩一直在南洋的文藝活動中持續，戰後的馬華文學的重要園地，不乏舊詩詞的專欄。在印尼禁華文期間唯一可以出版的華文版面，是軍方所屬的「印度尼西亞日報」(harian Indonesia)，其中也還有舊詩詞的專欄，受到傳統詩書教育的老一輩始終沒有放棄詩詞做為重要的文學活動，其持續力比起中港台的文藝園地要強得多。但是包括馬華文學在內的南洋文藝論者，多半以新文學為討論範圍，將詩詞創作排除在外，日後如何看待戰後存在的大批詩詞創作，還有待後人加以探究。

陳馬六甲所留下的傳記體的作品也是旅行文藝的特例，今天我們對陳馬六甲超越國界種族語言的中國之旅主要的資料來源仍是這本傳記。矛盾的地方是，這本傳記到目前為止主要還是被看成是革命文獻，是要瞭解陳馬六甲一身革命事蹟的最重要的材料，如果只用革命傳記的角度來閱讀將導致排除其跨越邊界的中國之旅，特別是由於這個華南／南洋華社的經驗對印尼人同時期的集體記憶而言是陌生的，因此論者談到陳馬六甲的「從監獄到監獄」都是跳過這段經歷不談，³⁹²至少到目前為止，筆者尚未發現有探討陳馬六甲華南之旅的意義的文章。因此就革命家的身份而言，傳記對旅行文藝極為不合宜的文類，不合宜的原因並非是作者寫作的問題，而是作品被閱讀的問題。問題是以革命家行誼

³⁹² 例如 Muhammad Yamin 在談到他流亡海外的旅程時，只提到上海、馬尼拉、曼谷與新加坡，華南這一段卻被略過去了。見 Muhammad Yamin, *Tan Malaka Bapak Pendiri Republik Indonesia*. Djawa Timur: Murba Berjuang, 1946, p. 2.

而言，如非革命傳記，革命家是不會好整以暇，以這樣大的篇幅來寫其旅程，因此以不合宜的文類做為旅行文藝似乎是難以避免的。而閱讀革命傳記的讀者也可能會略過對異域探索的記錄，特別是這樣的記錄在被認為和革命行誼沒有直接關係的情況下。

也許我們必須建構一種不同的旅行文藝的理論架構，以便包含像郁達夫和陳馬六甲的旅行記錄。如前所述，如果在亞洲同一時代，對於旅行實踐有不同於西方探索異域的傳統，那麼要期待同樣的旅行文藝的形式也是有困難。在亞洲也許欠缺旅行文藝自成一類的寫作或出版傳統，特別是郁達夫和陳馬六甲都分別處於中國現代文學(或者華文現代文學)以及印尼／馬來現代文學發展的時期，文藝的形式還在多方嚐試的階段。郁達夫所提倡的日記體寫作曾得到相當的呼應，他本人則有日記九種的出版，³⁹³但是他所提倡的遊記體寫作則未必受到同樣的重視，其《郁達夫南遊記》是後來將其幾篇文章收錄一起而成，寫作時並沒有自成一類的企圖，倒是其中幾篇遊記小品成為華教的國文教材，成為大眾耳熟能詳的作品。我們可以看到同一個時代中國作家到南洋的旅程，有陳達的筆記體式的《浪跡十年》，有鄭建廬的日記體式的《南洋三月記》，有巴人的紀實小說式的《印尼散記》，也有艾蕪的紀實散文式的《南行記》，都可以說尚在嚐試階段。而在印尼／馬來文學的發展更遲，雖然在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及三十年代開始發

³⁹³ 郁達夫，《郁達夫日記》。香港：一知出版社，1961年。

軀，然而主要的發展來自日本佔領期取消殖民文化的優勢地位之後，現代印尼／馬來文學才得以擺脫傳統文學的束縛，³⁹⁴而現代印尼／馬來文學的主題是以民族主義與社會變遷為主流，³⁹⁵旅行或是探索異域的作品如鳳毛麟角。³⁹⁶在這種情況下，有許多富於意義或是特殊興味的旅行實踐可能會被記錄在其他地方，我們對旅行文藝的形式採取更開闊的看法是應該的。

文學史的意義

郁達夫和有關郁達夫的南洋書寫一向被排除在馬華文學的討論之外，如同陳馬六甲也一向被排除在印尼／馬來文學之外。原因可能只是因為郁達夫做為中國新文學作家的性格太強，他是所

³⁹⁴ 馬來傳統文學，以古典馬來詩歌以及民間口傳文學為主，與現代文學創作有相當的距離，參考 R. O. Winstedt, *A History of Malay Literature*. London: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9. C. Hooykaas, *Over Maleische Literatuur*. [關於馬來文學] Leiden: E. J. Brill, 1937. Arifin Nor, *Kumpulan Sastera Lama Melayu*. [古典馬來文集] Kuala Lumpur: H. M. Shah Enterprises, 1959.

³⁹⁵ 印尼／馬來現代文學不論就發展的動力，所處的時代及所表現的主題，都和社會變遷息息相關，參考 Virginia Matheson Hooker, *Writing a New Society: Social Change Through the Novel in Malay*. Sydney: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2000. David J. Banks, *From Class to Culture: Social Conscience in Malay Novels Since Independ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Studies, 1987.

³⁹⁶ 在印尼／馬來文學中，缺乏像西方一樣存在為了專為記述旅遊的文類，也少有記述旅行的文學作品，現代印尼／馬來文學因為發展期間尚短，主要的文類還是現代詩短篇小說及戲劇，由於強調表現在地性，少有旅行紀實作品出現，參考 Johan Faaffar, Mohd. Thani Ahmad and Safian Hussain, *History of Modern Malay Literature*.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1992.

謂「中國南來文人」的代表人物，由於他已經早在中國就揚名立萬而被請到南洋。在戰後馬華文學尚未茁壯時，為了急於確立馬華文學的特質，將和中國關係太密切的作家視為僑民文學，而以能表達馬來亞特殊性者才視為馬華文學的正典。其實郁達夫正是在戰前即提倡南洋文藝以能表達南洋社會現實者為佳，以郁達夫在馬來亞鼓勵文藝後進的熱誠與成就，即使視其為馬華文學的催生者也不為過。³⁹⁷

就從郁達夫以作家的一生來說，郁達夫在 1938 年 12 月來到南洋，應聘為星洲日報的文藝版編輯，實則為生命中一個轉捩點，在此之前的郁達夫，和南洋沒有什麼特別的關連。郁達夫的形象在中國和在南洋有極大的不同，中國的郁達夫被認為是浪漫頹廢的作家，而且到了後期已經被文評家視為江郎才盡，到達南洋以前，剛剛為了他和王映霞的婚姻感情不睦而大打筆墨官司。而南洋的郁達夫則一方面是鼓動文藝風潮的帶頭大哥，另一方面又是正氣凜然的抗戰宣傳的旗手。³⁹⁸他在新加坡期間留下了為數可觀

³⁹⁷ 這裡所涉及郁達夫與馬華文學的關係可以另外以專文來討論，這裡限於篇幅無法詳細討論，簡單地說，許多研究都肯定郁達夫對馬華文學的貢獻，卻只能把他放在中國作者的範疇來討論，排除在馬華文學之外。如林萬菁，《中國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響》。新加坡：萬里書局，1994。黃傲雲，《中國作家與南洋》。香港：科華圖書出版公司，1988 年。

³⁹⁸ 見方修，〈郁達夫留給本地的一批文學遺產〉。《郁達夫抗戰論文集》。林徐典編，新加坡：世界書局，1977 年。

的散文及論述文章，³⁹⁹從文藝理論到政論都有，被視為影響日後馬來亞文壇第一人。⁴⁰⁰

然而郁達夫還有一個截然不同的角色，那就是蘇門答臘的郁達夫。像郁達夫這樣眾所矚目的作家，而其言行透過自己或是文友的作品，不斷地暴露在讀者面前，那麼作家的行徑就如同表演一般，而郁達夫又是最強調作品表露人生經驗，那麼實際上我們從這些有關的記述可以知道，其實蘇門答臘的一段人生經驗是郁達夫一生之中最精彩的表演，其中曲折離奇，充滿戲劇的張力，**只**可惜他在表演結束之後就被刺身亡，沒有辦法再以慣用的第一人稱的口吻，親自記述這一段旅程。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所有有關郁達夫的蘇門答臘之旅的文字記載，都是這個表演的觀察筆記，也應該是文學史觀照的焦點。只不過像郁達夫這種跨越國境的人物，相關的記錄也是散居各國，很難於放到目前有的文學分類範疇，不論是馬華文學或是中國新文學，於是蘇門答臘時期的郁達夫，則被排除在這些不同範疇的文學史之外。

陳馬六甲也是同樣的情況，其固然是以革命家的身份行事，這並不表示我們不能以作家的角度來討論陳馬六甲，的確像陳馬

³⁹⁹ 關於郁達夫在南洋期間的各種作品，見郁風編，《郁達夫海外文集》。北京：三聯書店，1990年。

⁴⁰⁰ 林萬菁在其以中國南來作家的研究中，表示「郁達夫在南來的眾作家之中，影響最大，成就也格外彰著。」，林萬菁，《中國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響》。新加坡：萬里書局，1994年，頁48。

六甲這樣長期流放的革命英雄，其主要的工作其實是思考與寫作，就文字生產工作而言和其他作家沒有兩樣，只不過他主要的寫作是以革命理論與革命宣傳為主，而這些資料多半已經散佚，如果印尼的國家檔案館還有收藏他的手稿，應該仍是限閱。⁴⁰¹而且早期的手稿多數是由荷蘭文寫成的，在現在的印尼已是乏人問津。目前可以看到比較清楚的是陳馬六甲在四十年代回到印尼以後的作品，則都是以印尼／馬來文寫作，其中最具份量的，自然是陳馬六甲的自傳，⁴⁰²以印尼革命史的角度來看，這是重要的革命史料，而以印尼／馬來文學史觀察，也是印尼／馬來新文學第一代作品中最重要傳記。

陳馬六甲從幾個角度來看都是屬於第一代作家，根據 C. Hooykaas 在 1937 年出版的 *Over Maleische Literatuur* [關於馬來文學]，馬來現代文學發軔於 1920 年代，1930 年代開始發展，作者背景絕大多數是受到荷蘭文的教育而開始從事寫作的，這和陳

⁴⁰¹ 到目前為止，對於和印尼共產黨有關的研究在印尼國內仍然還是禁忌，日前曾有對印尼共產黨的歷史研究開放給學術研究的呼聲，見 Antara News, "Ketua Dpa: Silakan Lakukan Pelurusan Sejarah" [要研究歷史請便], Antara, Monday, March 27, 2000. 但是這種意見卻立刻引起印尼國內勢力強大的穆斯林團體的反對，見 Antara News, "Amien Rais Jamin Tap MPRS XXV/1966 Tak Akan Dicabut", Antara, Saturday, April 08, 2000. [阿敏瑞斯保證阻止 1966 年 25 號法令撤消] 即使開始研究，研究的重點也會放在六十年代，再早以前的歷史，可能一時之間還不會開展。

⁴⁰² 同一時間陳馬六甲以印尼／馬來文出版的主要是政治與思想方面的論文，如 Tan Kalaka, *Madilog: Materialisme Dialektika Logika*. Jakarta: Pusat Data Indikator, 1999[1950].

馬六甲的教育背景是一致的。⁴⁰³以荷蘭當局當時在荷屬東印度所採取的精英主義教育政策，只有極為少數的本地土著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在印尼著名的小說家 **Promoedya** 的小說中出現的主人翁，⁴⁰⁴經常是以這種第一代印尼現代知識份子為類型，例如在其富於人道主義的作品”**Bumi Manusia**”（可譯為「人間世」）中投身反對殖民體制的主人翁 **Minke**，其所受到的教育與文化洗禮，以及介於印尼本地文化和歐洲文化之間處境，正是陳馬六甲這一代知識份子文化處境的寫照。⁴⁰⁵

另外，陳馬六甲的背景以及寫作的年代也和印尼現代文學的主流寫作隊伍相契合，例如蘇門答臘人在印尼/馬來文學史發展之初，扮演著最重要的角色。例如在 1940 年代主編 **Warta Malaya** 及 **Utusan Melayu** 的 **Abdullah Kamel**，以及主編 **Fajar Asia** 的 **Zainal Abidin Ahmad**，以及 **Berita Malai** 及 **Semangat Asia** 的編輯 **Zubir Salam** 以及作家 **Thaharuddin Ahmad**，都是蘇門答臘人。⁴⁰⁶這是因為蘇門答臘人，尤其是米南加保人，有敘事口傳文學的傳統，加

⁴⁰³ C. Hooykaas, *Over Maleische Literatuur*. [關於馬來文學] Leiden: E. J. Brill, 1937. pp. 185-193.

⁴⁰⁴ Pramodya 在印尼/馬來文學中享有盛名，並且幾度被提名候選諾貝爾文學獎。

⁴⁰⁵ Pramodya Ananta Toer, *Bumi Manusia*. [人間世] Kuala Lumpur: Wira Karya. 1990.

⁴⁰⁶ Li Chuan Siu, *Ikhtisar Sejarah Pergerakan dan Kesusasteraan Melayu Moden, 1945-1965*. [現代馬來文學與文學運動史綱] Kuala Lumpur: Penerbitan Pustaka Antara, 1978. pp. 32-34.

上地處馬來語和印尼歷史的交互衝擊，在印尼現代文學的發軔期正好發揮其特長，陳馬六甲的背景也和這一潮流相符合。而印尼／馬來文學有足夠的空間發展，則是從日治時代開始，包含重要的文學園地的報刊雜誌都是在日治時期發刊，而使得現代馬來文學從陳腐的傳統文學以及殖民主義的壓制中解放出來。⁴⁰⁷陳馬六甲正好生逢其時，在四十年代回到印尼的土地上發展，即在現代印尼／馬來文學開始大力發展之初，他即改用印尼／馬來文書寫，除了革命理論文獻以外，主要即是留下這本自傳。而陳馬六甲的自傳不論在份量上或是在格局上都是當時無出其右者，⁴⁰⁸我們沒有理由將其排除在印尼／馬來文學之外。⁴⁰⁹實際上在印尼現代史後來的發展，人物的傳記在歷史書寫上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⁴¹⁰只不過許多傳記的政治性格太強，缺乏文學的價值，如此則更顯得陳馬六甲自傳的價值。

⁴⁰⁷ Li Chuan Siu,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omo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Malay Literature, 1942-1962*. Yogyakarta: Penerbitan Yayasan Kanisius, 1975. pp. 17-22.

⁴⁰⁸ 四十年代在印尼可以相提並論的傳記體的作品有兩件，一是 Sjahrazad, *Indonesische Overpeinzigen*. [印尼的回憶] Amsterdam: Bezige Bij, 1945. 以及 Soetomo, *Kenang-kenangan Dokter Soetomo*. [蘇多摩醫生回憶錄] Jakarta: Penerbit Sinar Harapan, 1984 (1938). 份量上完全無法和陳馬六甲的傳記相比。

⁴⁰⁹ Helen Jarvis 即肯定陳馬六甲的自傳是在馬來／印尼文學上首屈一指的傳記體著作，即使是放在亞洲近現代的人物自傳書寫也仍是出色的作品。Helen Jarvis, *Introduction, In From Jail to Jail*. Athens, Ohio: Ohio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1, pp. 55.

⁴¹⁰ Susan Rodgers ed., *Telling Lives, Telling History: Autobiography And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Modern Indone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跨界的文化接觸

雖然說郁達夫和陳馬六甲的旅程特殊，不過相同流亡經驗並非是孤立現象，同一時間從新加坡逃往蘇門答臘的華僑華人很多，其中作家編輯等文化人也不在少數，⁴¹¹尤其是所謂的「中國南來作家」，即太平洋戰爭以前從中國到新加坡的作家，幾乎都到了蘇門答臘，或是由蘇門答臘轉赴其他各地，⁴¹²這批人在特殊的時代背景，突然來到地廣人稀的蘇門答臘島，而且隱避在鄉村，和當地印尼／馬來人相處，這種特殊的流放經驗究竟有何意義，值得探究。從這批專職寫作的作家、記者與編輯日後的經驗來看，這個流放經驗顯然是一種真正的文化洗禮，這些南下南洋前來支持抗戰宣傳的文人，都只集中在新加坡過都會生活，並不曾真正接觸當地的土地與人民。被迫避在鄉間三年時間，這些文人對於本地馬來人或者印尼人都有實質的接觸，也影響了他們日後所從事的文化活動。

從目前已知的事蹟來看，顯然這文化接觸的影響是鉅大的，戰爭結束以後有一部分人決定留在印尼，為印尼的前途貢獻心力。原為中國名記者的王紀元前往雅加達辦報紙，就是在獨立以

⁴¹¹ 其中較著名的有郁達夫、胡愈之、巴人、邵宗漢、張楚琨、王紀元、沈茲九、金丁、高雲覽、楊騷等人。

⁴¹² 關於中國南來作家的研究，見林萬菁，《中國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響》。新加坡：萬里書局，1994。

後的印尼有相當影響力的「生活報」，是戰後率先鼓勵印尼華人認同印尼，支持印尼獨立運動的重要華文報紙。也有決定留在蘇門答臘當地者，則組織當地青年，加入印尼革命的行列，進行華人社會中的社會革命，其中最著名的是王任叔所開辦的印尼「民主報」。⁴¹³另有一部分文人則回到新加坡，在新加坡從事新聞及報業工作，他們不斷地在報章雜誌上發表文章，鼓勵當地華人協助本地人爭取反抗殖民地爭取獨立，其中較著名的有胡愈之。⁴¹⁴胡愈之戰前在馬來亞激勵民主意識，戰後並且結合一批作者文人，辦報出雜誌鼓吹新思想，他們的特殊經驗使得他們的論述位置變得十分曖昧，中國南來作家強調華人融入當地文化，後來引發的馬華文學獨特性的論爭，卻又被指涉為「僑民文學」，就是指馬來亞的僑民，以暫時僑居馬來亞的心態從事文學創作，而這個論爭又成為馬華文學具有強烈認同意識的起源。⁴¹⁵

⁴¹³ 王任叔，小說家，筆名巴人，原在中日戰爭爆發之後想到美國從事抗戰宣傳工作，因為未能取得簽證，滯留香港，留港期間為南洋報紙寫稿，後來被南洋星洲日報延攬到新加坡，在南洋師範學院教書，到新加坡後即積極從事抗戰宣傳工作，幾個月後太平洋戰爭爆發，王任叔隨之流亡蘇門答臘。戰後決定留在棉蘭，創辦民主日報。1948年被荷蘭當局驅逐出境。後來成為中國第一任駐印尼大使，著有「印度尼西亞史」以及多篇和印尼有關之散文、小說及劇本。

⁴¹⁴ 胡愈之，戰前已是出名的專欄作家，長於國際時事分析，中日戰爭開始之後，為陳嘉庚延攬到南洋，任職南洋商報總主筆，曾經在南洋商報上撰寫一連串鼓勵南洋華人投入支援抗戰工作。戰後在新加坡創辦風下雜誌，後出任陳嘉庚所創辦的南僑日報社長，1948年離開新加坡。

⁴¹⁵ 這個問題涉及對馬來亞文學獨特性的論戰之解釋，應該另以專文詳論之，這裡限於篇幅難以仔細討論，在此僅僅表明這個越境之旅與文化接觸經驗在日後的影響有更深遠的發展。

雖然這批中國南來作家為馬華文學論者定性為僑民文學，認為他們仍是心在中國，關心中國時政，最後選擇離開馬來亞而回到中國。⁴¹⁶然而他們其實是戰後第一批站出來，呼籲華人社群要多加學習印尼/馬來語，親善印尼/馬來社群，對戰後推動華人社群將中國認同意識轉變為當地公民意識，實在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⁴¹⁷但是這些發展卻在日後馬華文學的研究中，成為被排除的對象，關於這些南來文人的影響及意義，顯然尚待進一步研究。在這批作家中，郁達夫被認為是所有這些作家中對馬來亞最具影響力。⁴¹⁸如果我們將戰前馬來亞的文化活動，日本佔領期的蘇門答臘經驗和戰後的文藝發展連在一起看，這些作家的蘇門答臘經驗的確起了承先啟後的轉折作用，而這些文人集體經驗顯然和郁達夫的旅程有直接的關係。

陳馬六甲的文化接觸經驗則看起來像是一個孤立的個案，同時代似乎很少見到有同樣的經驗者，因此他的經歷成為印尼領導人物中對華人／中國親善的範例，Benedict Anderson 在其著作如此評論：「不會有其他印尼的領導人如陳馬六甲可以這樣公開表達對華人親善，也不會有其他印尼的領導人如陳馬六甲可以這樣免

⁴¹⁶ 黃傲雲，《中國作家與南洋》。香港：科華圖書出版公司，1988年。

⁴¹⁷ 劉冰，〈胡愈之と南洋華僑—三重の身元みのもとをもった人物と軌跡〉。《東南アジア華僑と中國——中國歸屬意識から華人意識へ》。東京：亞細亞經濟研究所。1993年，頁148。

⁴¹⁸ 林萬菁，《中國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響》。新加坡：萬里書局，1994年，頁175-185。

於種族的偏見」。⁴¹⁹然其文化接觸的經驗也與後來有關介於華文世界及印尼文世界的人與事都有如絲如縷的關係。例如在集美(Chip-Bi)和陳馬六甲住在一起的年輕室友李全壽(Li Chuan Siu 或 Lie Tjwan Sioe)，日後成為第一代研究印尼／馬來文學的學者，後來南洋大學成立後，富有以南洋為研究主體的思想，李全壽應聘成為印尼／馬來文學的教授，教導華裔學生深入理解印尼／馬來文學的成就，早期研究印尼／馬來文學領域的學者有很多是華人，和南洋大學提倡這方面的研究有直接關係，例如廖裕芳，陳達生等人都有這一層淵源。⁴²⁰後來李全壽又被聘到澳洲雪梨大學任教，也使得後來澳洲從事印尼／馬來文學的學者得以培養出來，其中多數與李全壽有直接或間接的師承關係。

另外在印尼本地對華人處境表達關懷的知識分子，幾乎都和印尼左派有關，這雖然可能和意識形態有關，然而陳馬六甲的作品做為早期印尼左派的精神導師，一開始就使得印尼左派對華人文化有較深刻的理解，例如在印尼文壇享有盛名的作家 Pramoedya Ananta Toer，⁴²¹即對印尼華僑的處境表達了強烈的人文關懷，其

⁴¹⁹ Benedict Anderson, *Java in a Time of Revolution: Occupation and Resistance, 1944-1946*.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274.

⁴²⁰ 關於新馬華人鼓勵印尼／馬來文學研究，並在南洋大學開設講座，見 Li Chuan Siu,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omo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Malay Literature, 1942-1962*. Yogyakarta: Penerbitan Yayasan Kanisius, 1975. pp. 42-43.

⁴²¹ Pramoedya 雖然是印尼／馬來文學的代表人物，作品卻主要在印尼境外流傳，因此他的觀念和印尼國內主流有相當距離，關於這一點，參考 Anthony H. Johns, "Pramudya Ananta Tur: The Writer as Outsider: An Indonesian Example"

作品”*Hoa Kiau di Indonesia*”[華僑在印尼]。到目前為止仍是對華僑親善最具有代表性的印尼文學作品，⁴²²Pramoedya 本人是共產黨員，⁴²³相信他是讀過陳馬六甲的傳記。⁴²⁴而陳馬六甲的社會主義思想，日後感召了六十年代學生運動的領袖如 Soe Hok Gie 及 Arief Budiman，他們都是戰後第一代直接投身印尼改革運動的華裔。⁴²⁵而陳馬六甲的事跡在印尼本地，特別是在蘇門答臘，則有將其冒險事跡寫成小說等文學作品流傳的情況，因此陳馬六甲的文化接觸，具有可能的意義和影響，還有待未來進一步的探索。

如果將這兩種的文化接觸經驗的定義放寬來看，放在較長的歷史脈絡中，則兩者還有極為微妙的交錯關係，這些交錯關係卻

Cultural Options and the Role of Tradition: A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Modern Indonesian and Malaysian Literature.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141-187.

⁴²² Pramoedya Ananta Toer, *Hoa Kiau di Indonesia*. [印尼的華僑] Jakarta: Bintang Press, 1962.

⁴²³ Pramoedya 其作品在印尼國內多半都成為禁書，只有在海外比較容易購得，這是和 Pramoedya 是共產黨員，並且因此而成為政治犯有關。前述 *Hoa Kiau di Indonesia* 也是禁書，在印尼國內流傳十分有限。

⁴²⁴ Pramoedya 在最近一篇文章談到英國在東南亞的殖民地和印尼的關係時，特別提到了陳馬六甲在英國屬地的華人社群的良好關係，他應該是熟知陳馬六甲的事蹟與作品。見 Pramoedya Ananta Toer, “G30S Tak Lain Metamorphosis Politik Anti-Konfrontasi Inggris.” *Pengantar pada Buku Greg Poulgrain: The Genesis of Malaysia Konfrontasi: Brunei and Indonesia, 1945- 1965*. Crawford House Publishing, 1997.

⁴²⁵ Soe Hok Gie 的漢名為史福義，Arief Budiman (Soe Hok Djien) 的漢名為史福仁，兩兄弟都富有社會主義思想，成為六十年代印尼學生運動的知名領袖。見 Nanang Krisdinanto, 'Warisan Terakhir' Soe Hok Gie: Orang-orang di Persimpangan Kiri Jalan Penulis: Soe Hok Gie Penerbit Yayasan Bentang Budaya. *Surabaya Post*, Minggu, 07 September 1997. [史福義最後的軼事]

也都和馬華文學有極為密切的關係。馬華文學形成比較清晰的意識，與四十年代馬來亞左翼文學的發展有關，也和馬來亞共產黨帶領馬來亞華青組織抗日的經驗息息相關，然而馬來亞共產黨的成立卻是由於印尼共產黨領袖途 Musso 經新加坡時接觸華裔青年而促成的。而戰後的馬來亞與新加坡有一段時期華人社會興起研究、介紹及翻譯馬來文學，這是後來促成南洋大學設立馬來文學研究的重要背景，出身印尼的學者李全壽於是應聘到新加坡，如果追溯華社這種對馬來文學的興趣的源頭，則正是當年這批有蘇門答臘經驗的作家在戰後開始即大力提倡的影響。馬華／馬來／印尼文學的交錯關係，緊緊地扣著四十年代的文化接觸經驗。

旅者在異域中面對陌生的語言

兩位旅者對於在異域中如何面對陌生的語言，都提供了令人激賞的事蹟。郁達夫學習得較快，郁達夫亂離雜詩第四首其中有「閑來蠻語從新學，嫩隅清池記鯉魚」的詩句，據鈴木正夫的考證，這首詩是在郁達夫從外島望嘉麗到對岸的蘇門答臘島的 Sungai Pakning 時所寫的，這是郁達夫剛剛踏上蘇門答臘本島時，由此我們知道他一開始流亡蘇門答臘時就開始學習印尼/馬來語。然而逼得他必須很快上手的原因，卻是他成為日本的通譯以後，當王任叔問他如何學習馬來語，他感慨地表示這涉及馬來人的皮

肉之苦，他必須立刻學會，因為當其翻譯馬來語有所遲疑時，日軍即以為馬來人的言詞閃爍，隨之加以毒打一頓，逼得郁達夫不得不迅速進入情況，經過一段時間之後，郁達夫變得很有把握，以後替馬來人翻譯時，如果聽到馬來人說得不很合乎日本人性格的話，他便代為修改一下，免得他們受到皮肉之苦。後來郁達夫在蘇門答臘結婚，對象雖是華裔女子，卻無法和郁達夫用華語交談，他們彼此主要是用印尼/馬來語溝通，由此也可看出郁達夫此時的印尼/馬來語水平已經達到相當程度。

郁達夫在巴翁公務時也開始學習荷蘭語，也是為了擔任通譯工作的緣故。郁達夫所以能學習荷蘭語很快，因為郁達夫自中學起即會德文，然後到了蘇門答臘以後，郁達夫到處收集荷蘭文圖書，每天卷不釋手，以致於很快上手。他甚至因此和當地一位荷蘭女子談戀愛，談得熱烈時這名荷蘭女子甚至想嫁給他，他考慮到在日本統治下，荷蘭人仍是被視為敵國人，為了避免日本軍人懷疑，郁達夫沒有答應。在許多人的記述中都提到了郁達夫是學習外語的天才，每到一處就到處收集外語書籍，然後整天閱讀，就這樣郁達夫在蘇門答臘期間，很快地掌握到在印尼所使用的最主要的共同語言，馬來語與荷蘭語。⁴²⁶

⁴²⁶ 當時的荷屬東印度應該是以荷蘭語與馬來語並列為共同語，其中荷蘭語是官僚與精英知識階層的語言，而馬來語則為大眾的語言。見 Kees Groeneboer, *Weg tot het Westen. Het Nederlands voor Indie 1600-1950, Een taalpolitieke geschiedenis*. [通往西方之路：荷蘭語在印尼，一個語言政策的歷史] Leiden: 1993.

郁達夫是在這一群流亡蘇門答臘的文人之中最早開始學習馬來語的，也是最快上手的，此一作風很快地影響其他一起逃難的文人，後來政論名筆胡愈之也學會了馬來語，並且開始閱讀馬來語報紙，以便從中得知日軍的情勢，⁴²⁷也因而寫成了第一本以中文寫作的現代印度尼西亞語文法書，⁴²⁸他因此組織了讀書會，研讀資料，成員至少包括王任叔、邵宗漢、張楚琨、沈茲九及金丁等作家文人，這時候他們開始從馬來語的報紙上得知印度尼西亞革命的消息，他們也開始將馬來語的名稱改為印尼語，並且把研讀報紙研判時局的重點從日軍的動態，轉變到對印尼革命的關切上。這其中對王任叔的改變最大，他對印尼人民開始有強烈的同情，對印尼革命更是不留餘力地支持。後來成為獻身印尼革命，投身印尼史的研究工作，成為中國第一任駐印尼大使，都是在日本統治下的蘇島流亡經驗開始。⁴²⁹而這一段日後對華人和馬來亞／印尼關係有重大影響的流亡接觸經驗，這些在中國作家開始學習印尼／馬來語言及文化習慣，就是由郁達夫的通譯角色開始的。

陳馬六甲也是學習外語的天才，當 1927 年 8 月陳馬六甲在馬尼拉被出賣而被美國殖民政府逮捕時，當時的 *Manila Daily*

⁴²⁷ 張楚琨，〈胡愈之在南洋的七年〉。《胡愈之印象記》。北京：中國友誼出版社。1989 年，第 171 頁。

⁴²⁸ 沙平，《印度尼西亞語語法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 年。

⁴²⁹ 關於王任叔在流亡蘇門答臘期間對印尼人民的態度的轉變，主要參考巴人，《印尼散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年。

Bulletin 報導，「陳馬六甲被捕，一個爪哇布爾什維克黨人，會說各種語言，荷蘭語、英語、德語、法語、查加洛語、華語、馬來語....」⁴³⁰實際上在當時他的華語只是懂得一些。在他自己的記述中，他承認其實當時他的華語能力還十分有限。當陳馬六甲第一次隱居在華南時，剛開始即有鄰居婦人對他十分照顧，陳馬六甲叫她 tao-chi(大姐)，曾經去過菲律賓，然而因為陳馬六甲當時尚未學會福建話，他們之間很難真正有對話。⁴³¹後來 tao-chi 因病過世，陳馬六甲也沒有記錄到他何時學會了福建話。但是在第二次隱居在華南時，他華語及福建話已經沒有問題了，甚至可以用以辦學校教授英語，參與村民生活，以及和學生討論思想問題。

陳馬六甲在其傳記中，不厭其煩地記錄中國的社會變遷與生活習俗，並且大量利用福建話的詞彙來說明，這種態度與成就，也是在印尼／馬來文學中很少見到的，類似的情況，可能只有如梁友蘭(Nio Joe Lan) 在六十年代專用印尼文寫作介紹中國語文和文化，來協助印尼民眾理解華人文化的著作可以相提並論。⁴³²陳馬六甲除了對語言本身有興趣以外，同時對於語言使用的社會情況也相當關心，例如解釋廣東話與福建話的使用群體不同，以及不同語族在社會中遭遇的情境。考察東南亞近現代史，不乏華人

⁴³⁰ Tan Malaka, *Dari Penjara ke Pandjara*, 1948, Vol. I. pp. 158.

⁴³¹ Tan Malaka, *Dari Penjara ke Pandjara*, 1948, Vol. I. pp. 183.

⁴³² Nio Joe Lan, *Peradaban Tionghoa Selajang Pandang*. [印尼華裔文化一瞥] Djakarta: Keng Po. 1961.

參與東南亞當地政治活動的例子，華人學習當地語言，介入當地生活，反過來說卻少有當地人學習華語，參與到華人的知識活動。那麼陳馬六甲算是少數的例外，他不但中英文俱佳，還被中國左派人士根據其出版品認為是托派人物。以印尼本地人來說，陳馬六甲能夠深入到中國語言到這種程度，應該是絕無僅有的第一人。

由於印尼當局後來採取禁止華語華文的政策，造成印尼整整一代人對華語華文缺乏認識，以致於迄今印尼缺乏足夠人才通曉華語文，更談不上漢學研究的發展，這種情況對任何世界上重要國家而言都是罕見的，可以說在華人最多的地區，卻是漢學研究最薄弱的地區。⁴³³在馬來西亞語言仍然是重要而敏感的課題，執政當局對於華文教育仍是疑慮深重。東南亞國家普遍有這樣的情況，華人多半通曉當地語言，而本地民族卻少有人通曉華語華文，其中的原因之一，是當地人產生畏懼學華語文心態，這種情況到了最近始有所改善。回顧相關歷史，可以知道陳馬六甲的例子殊為不易，堪為文化交流的模範。歷來東南亞華人與本地人的文化交流都是單向交流，只有華人學習當地文化，卻少有當地人學習中華文化，如果東南亞當地的革命英雄，曾經出現能夠參與華人的知識活動者如陳馬六甲，也算是典型在夙昔，值得進一步發揚。

⁴³³ 關於印尼禁華語文的前因後果，見楊聰榮，〈文化認同與文化資本：印度尼西亞華語文問題的新發展〉。《華文世界季刊》，5(5)，頁 249-262，1997 年 12 月。

跨界旅行的化身之旅

郁達夫和陳馬六甲的特殊旅程都涉及化身的問題，由於特殊的時空，他們都必須化身為另一個身份在異域中生存，陌生的身份與陌生的環境互動，都使得他們的旅程增添神秘的色彩。這個化身的角色也有文化史的意涵，兩個人都化身為華僑的身份。兩個人都不是一般傳統認定的華僑，但是如果考慮華僑的多樣性，則他們也都可以是華僑，像郁達夫這樣南來僑居，就當時出洋為僑，返國又恢復原來身份的第一代移民的一般情況來說，郁達夫當然可以是華僑。即使是像陳馬六甲這樣和華人血統毫無關係的米南加保人，在中國南方住上幾年，語言上可以溝通，又學習了不少華南文化，完全有能力在南洋華人社群中生活，也不會被華人社會排斥，華人本來即可以文化上來定義。最重要的是他們都發揮了南洋華人的特性。

戰後由於東南亞各國紛紛取得政治上的獨立，華人在新的國家架構之內尋求新的認同位置，因此應以各個國家的脈絡來理解，但是除了國家的架構之外，南洋華人尚有一種超越政治與文化界限的特質，特別是和東南亞各民族做一比較，可以看出南洋華人具有多語多文化的特質，同時對於不同文化環境的適應能力

特別強。⁴³⁴這是目前強調以民族國家為主要分類架構的東南亞華人研究較少去強調的特質。在郁達夫和陳馬六甲的化身中，卻正好突顯這種特質。如果缺乏南洋華人這種多語多文化，跨越政治疆界與文化障礙的能力的特質做為化身的中介角色，這個化身之旅是不會成功的。這種情況是任何東方人到西方或是西方人到東方，無法以同樣的中介角色來形成化身之旅的主要差別所在。這是郁達夫和陳馬六甲的越境之旅得以實踐的重要機制。

這個中介角色在陳馬六甲和郁達夫的跨越文化之旅變得和西方人對東方或是其他第三世界地區的旅程很不一樣。西方人到異域去旅行，他的身份對當地人來說註定是個異己，而他也是以異己的眼光來看待其所旅行的地方。這和郁達夫和陳馬六甲在中國與印尼之間的互訪很不相同，他們在到達之初也同樣是以異己者的身份到達，然而透過與華僑的交往，他們至少可以與當地人直接溝通接觸，而這種接觸是全面而且深入，而非一直停留在印象式的陌生感。因此華僑不只是他們介入當地時隱藏其異己性格而化身的中介性角色，也是他們接觸與學習當地語言與事務的機制。

華僑做為化身的中介角色，最後更成為他們變化身份融入當地社會的橋樑，郁達夫透過和當地土生華女結婚，象徵其變化其

⁴³⁴ 許多對於華人的研究都喜歡強調華人在文化上的保守性，其實華人對異文化的接受程度是很高的，才得以在各地都可以適應生存，見可兒弘明、游仲勳編，〈華僑の異文化適應と受容力〉。《華僑華人》。東京：東方書局，1995年，頁155-172。

化身身份而成為當地一個真實角色的決心，而陳馬六甲則以收養關係，歸化為中國國籍，透過這種結合，這使得他們得以改變原來異己者的身份而成為當地的一份子。郁達夫這段婚姻令很多人感到訝異，一個浪漫風流的大文豪，曾經為其愛情鬧得風風雨雨的郁達夫，最後竟肯與一位不識漢字，姿色不佳的土生女子成親，其實從這個角度來看，可以表示郁達夫在文化洗禮後的轉折。同樣地，陳馬六甲做為一個印尼鼓舞民族主義最重要角色的革命家，竟然願意在華南及華人社會久居，而成為當地的一份子，勢必不能為印尼民族主義情緒高張的印尼知識階層所理解，然而對照陳馬六甲在莫斯科為亞洲社會發言的情況，他做為一個民族主義者的胸襟，其實是跨越國界與種族界限的。

做為中介身份的華僑或是華人，其實也是同樣的命運，華僑華人的特質其實是跨越國界與種族界限的，其隨遇而安的人生態度，也和郁達夫或是陳馬六甲的旅程一樣，是以一種 *rantau* 的方式來面對土地，他們對異文化的容忍度很高，甚至對不同種族的朋友也很開放。不幸的是，華僑華人卻是被後來發展出來的民族主義兩面夾殺，中國民族主義者要求他們愛祖國，回歸中華文化，使得他們原來對異文化的開放態度成為被中原正統排斥的對象，要求捐輸時卻又不忘記加強聯繫，而後來土著民族主義興起之後，他們又因為其文化特質而被排斥，為了保持和各方聯絡而保持其語言能力反而被懷疑有二心。其實具有多語言能力及具有跨

越國界能力的特質，正好是華僑華人成為今日肯定追求跨越邊界的佼佼者的主要原因。郁達夫和陳馬六甲的旅程正好彰顯出這樣的特質，知名如這兩位非凡人物，尚且因為介於兩個文化之間被忽視，而多數有能力進出兩種文化的華僑華人則很難逃脫註定被排斥在兩種主流文化之外的命運。

跨境旅行的文化交流

郁達夫與陳馬六甲的越境之旅，50年後的今天來看仍有相當的意義。印尼和中國是兩個亞洲的大國，歷史上有很多的來往，而印尼是世界上海外華人人口最多的國家，理應成為中華文化和其他文明最重要的交流渠道之一，實際上卻相反，後來成為亞洲兩個缺乏互動交流，互相不瞭解的文化體系。印尼在獨立以後，曾經一度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海外華語教育，五十年代開始壓縮當地華人的文化空間，到了六十年代則全面禁止華語華文，對當地華人採行強迫性的同化政策。發展過程固然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幾十年下來，卻使得華人世界和印尼人世界缺乏溝通瞭解，誤解一年一年地累積堆陳，積重難返。1998年5月，當革命的火焰再度在印尼燃起，大學生為首集結群眾抗議政府而引發暴亂，推翻長期執政的蘇哈托政權，人稱五月人民革命，同時卻傳出在暴亂中出現集體強暴華裔婦女的慘劇，這可能有政治陰謀故意差

辱華人製造動亂，有可能是地方宵小趁法律假期作亂，不論是那一種情況，都顯示種族間隔閼深重，藩籬難以突破，至今還找不到出路。⁴³⁵馬來西亞的種族關係相對來說好很多，然而族群政治長期籠罩社會，形成許多不平衡的體制持續的最好藉口，長期以來有識之士都一再思考打破族群政治思考邏輯，至今仍然未能突破。思考東南亞現代歷史，的確缺乏能夠溝通華人世界與印尼/馬來世界的英雄類型，使得民眾在思考族群關係時，缺乏足夠的文化資源。

其實郁達夫和陳馬六甲的旅程，正是突破華人世界與印尼人世界的新範例。雖然郁達夫和陳馬六甲的事蹟早有記錄，在四十年代已經有足夠的記錄資料，雖然旅程引人入勝，人物十足風采，在當時即為人所津津樂道，但只是當做軼事來看待。後來卻長期為人所忽視，可能是由於其事蹟分別跨越出原有的文化體系所關照的知識範圍，因此湮沒不彰。然而正是由於其跨越出原有文化體系的範圍，在今日我們肯定跨越邊界，突破文化障礙的時候，郁達夫和陳馬六甲的旅程更顯得珍貴。

許多種族之間的誤解導源於政治關係，民眾與民眾之間則不須要用同樣思考模式。在民族主義盛行的時代，當國家與國家之間有衝突與違和，導致所有文化交流斷層。郁達夫和陳馬六甲的

⁴³⁵ 關於印尼發生的反華暴動的歷史，詳見楊聰榮，《新秩序下的混亂—從印尼暴動看華人的政治社會關係》。台北：台灣國際研究學會，2007年。

旅程可貴的地方卻是在他們的關係是屬於平民的，僅僅是普通平民百姓間的交往，但是放在兩個文化體系交流的立場，卻有開啟新局的意義。在近現代史中亞洲各國民眾頻繁交往，要找到類似於郁達夫和陳馬六甲的例子應該還有不少。我們應該致力於發掘更多這種民眾交流的例子，否則目前既有的學術研究集中在外交史或是國際關係，而二十世紀主要議題則集中在族群、宗教、民族主義與意識形態的對抗，窄化我們對亞洲各國之間關係的理解。

郁達夫與陳馬六甲的越境之旅，也觸發了文學活動，雖然文學活動的範圍涉及華南／星馬／印尼，卻尚無法在即有的文學架構中被理解，只能在馬華／馬來／印尼文學的周邊打轉。文學史的分類原來是為了協助理解文藝活動，然而文學史卻漸漸形成與國史同樣方式來界定邊界，而且如同國史一般，不斷溯及既往，即在地理界限上做出限制而在時間上做出延伸，無法在這種文學史分類架構下被適切理解的作者／文本／文類／形式，自然被排除在外。將郁達夫和陳馬六甲放回原來的時空，當時的馬來亞與印尼只是被殖民主義分割的地理名詞，當時馬來人／印尼人則共享 *Orang Melayu* 的自我認同，如同兩地華人共享南洋華人的意義一樣，如今分隔開來以後，跨越重重邊界的郁達夫與陳馬六甲，反而無以定位。

郁達夫與陳馬六甲所涉及的文學活動，卻正好和後來馬華文學／馬來文學／印尼文學的起源或發展直接相關，同時他們跨境

之旅也開啟日後華文世界與馬來／印尼文世界互相交錯理解的契機，兩位都有清楚的亞洲意識，極願意與亞洲不同的民族文化打交道，同時他們都有來自歐洲文明深刻影響，並不打算以狹隘排他的方式來對待歐洲文化在這個區域的深刻影響。對照後來本區文化發展的情況，他們對往不同文化的態度更顯難得，往後民族主義甚至是族群民族主義成為文化上自我防衛的工具，也產生了對不同的異己缺乏理解興趣的文化氛圍。兩相對照，對於現在的文化情狀，不論是印尼、星馬、中港台，應該有啟發的作用。

此外，探求亞洲各國之間的關係，對於文化研究本身也將會有積極的意義。亞洲各地之間的關係，其文化溝通的障礙與困難度不亞於東西方的文化差距，而其重要性也不小於殖民關係或是東西方之間的關係，而歷史上的相互交往的具體實例也很多。如果看待文化交流或者文化接觸的眼光，只放在殖民宗主國與被殖民國家，或是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的關係，無法理解人類文化歷史的不同面貌，反而形成對文化課題思考上的侷限。而東西方之間的關係已經有很多的討論，幾乎各個不同層面都有很多人涉及，而亞洲各文化之間的關係則仍如處女地一般，尚待進一步的挖掘開墾。而且由於各文化體系之間具體的文化特質不同與歷史發展的差異，其關係的討論則足以豐富我們對於文化研究或文化史研究之不同層面的理解。

參考文獻：

Anderson, Benedict, *Java in a Time of Revolution: Occupation and Resistance, 1944-1946*.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2.

Anderson, Benedict, *The Pemuda Revolution: Indonesian Politics, 1945-1946*. PhD. Thesis in Cornell University, 1967.

Banks, David J., *From Class to Culture: Social Conscience in Malay Novels Since Independ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Studies, 1987.

Faaffar, Johan, Mohd. Thani Ahmad and Safian Hussain, *History of Modern Malay Literature*.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1992.

Groeneboer, Kees, *Weg tot het Westen. Het Nederlands voor Indie 1600-1950, Een taalpolitieke geschiedenis*. Leiden: 1993.

Hiorth, Finngeir, "Indonesie: Geruchten van Atheïsme." *De Vrije Gedachte*, 3, 1997.

Hooykaas, C., *Over Maleische Literatuur*. Leiden: E. J. Brill, 1937.

Jarvis, Helen, *Introduction, In From Jail to Jail*. Athens, Ohio: Ohio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1.

Johns, Anthony H., "Amir Hamzah: Malay Prince, Indonesian Poet" *Cultural Options and the Role of Tradition: A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Modern Indonesian and Malaysian Literature*.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124-140.

Johns, Anthony H., "Pramudya Ananta Tur: The Writer as Outsider: An Indonesian Example" *Cultural Options and the Role of Tradition: A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Modern Indonesian and Malaysian Literature*.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141-187.

Komunitas Bambu ed. Tan Malaka, *Islam Dalam Tinjauan Madilog*. Jakarta: Komunitas Bambu, 1999.

Li Chuan Siu,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omo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Malay Literature, 1942-1962*. Yogyakarta: Penerbitan Yayasan Kanisius, 1975.

Li Chuan Siu, *Ikhtisar Sejarah Pergerakan dan Kesusasteraan Melayu Moden, 1945-1965*. Kuala Lumpur: Penerbitan Pustaka Antara, 1978. pp. 32-34.

Loeb, Edwin M., *Sumatra: Its History and People*.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1935].

Mangunwijaya, Y. B., "Sosialisme Indonesia." *Kompas*. Kamis, 14 November 1996.

Mrazek, Rodolf, *Semesta Tan Malaka*. Yogyakarta: Bigrah Publishing. 1994

Nio Joe Lan, *Peradaban Tionghoa Selajang Pandang*. Djakarta: Keng Po. 1961.

Nor, Arifin, *Kumpulan Sastera Lama Melayu*. Kuala Lumpur: H. M. Shah Enterprises, 1959.

Poeze, Harry, *Tan Malaka: Strijder voor Indonesie's Vrijheid*,

Levensloop van 1896 tot 1945. Gravenhage: Martinus Nijhoff, 1976.

Reid, Anthony, *Indonesian National Revolution, 1945-50*.

Hawthorn: Longman, 1974.

Sjahrazad, *Indonesische Overpeinzingen*. Amsterdam: Bezige Bij, 1945.

Soetomo, *Kenang-kenangan Dokter Soetomo*. Jakarta: Penerbit Sinar Harapan, 1984 (1938).

Susan Rodgers ed., *Telling Lives, Telling History: Autobiography And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Modern Indone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Tan Kalaka, *Madilog: Materialisme Dialektika Logika*. Jakarta: Pusat Data Indikator, 1999[1950].

Tan Malaka, *Dari Pendjara ke Pandjara*. Djogjakarta: Pustaka Murba, 1948.

Toer, Pramoedya Ananta, "G30S Tak Lain Metamorphosis Politik Anti-Konfrontasi Inggris." *Pengantar pada Buku Greg Poulgrain: The Genesis of Malaysia Konfrontasi: Brunei and Indonesia, 1945- 1965*. Crawford House Publishing, 1997.

Toer, Pramoedya Ananta, *Bumi Manusia*. Kuala Lumpur: Wira Karya. 1990.

Toer, Pramoedya Ananta, *Hoa Kiau di Indonesia*. Jakarta: Bintang Press, 1962.

Virginia Matheson Hooker, *Writing a New Society: Social Change Through the Novel in Malay*. Sydney: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2000.

Winstedt, R. O., *A History of Malay Literature*. London: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9.

Yamin, Muhammad, *Tan Malaka Bapak Pendiri Republik Indonesia*. Djawa Timur: Murba Berjuang, 1946.

劉冰，〈胡愈之と南洋華僑--三重の身元みのとをもった人物と軌跡〉。《東南アジア華僑と中國----中國歸屬意識から華人意識へ》。東京：亞細亞經濟研究所。1993年，頁148。

劉心皇，〈郁達夫與王映霞〉。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

巴人，〈印尼散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張楚琨，〈胡愈之在南洋的七年〉。《胡愈之印象記》。北京：中國友誼出版社。1989年。

方修，〈郁達夫留給本地的一批文學遺產〉。《郁達夫抗戰論文集》。林徐典編，新加坡：世界書局，1977年。

方修編《郁達夫抗戰論文集》，新加坡：世界書局，1977年。

方修與張笏編，《郁達夫研究資料》。新加坡：萬里書局，1977年。

林萬菁，〈中國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響〉。新加坡：萬里書局，1994年，頁175-185。

楊聰榮，〈文化認同與文化資本：印度尼西亞華語文問題的新發展〉。《華文世界季刊》，5(5)，頁249-262，1997年12月。

楊聰榮，《新秩序下的混亂—從印尼暴動看華人的政治社會關係》。台北：台灣國際研究學會，2007年。

沙平，《印度尼西亞語語法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

洪北江編，《郁達夫全集》。香港：大眾出版社，1961年。

王任叔，《印度尼西亞近代史》。周南京整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王紀元，《我與三聯》。香港：三聯書局，1978年。

胡愈之，《郁達夫的流亡和失蹤》。香港咫園出版社，1946年。

艾蕪，《南行記》。上海：生活書局，1935年。

莊惠泉編，《新馬華人抗日史料》。新加坡：文史出版有限公司，1984年。

葉忘憂編，《郁達夫選集》。現代創作文庫。上海：中央書店，1937。

郁達夫，〈雪夜——日本國情的記述自傳之一章〉。《宇宙風》，第11期，1936年。

郁達夫，〈馬六甲遊記〉。《郁達夫南遊記》。台北：大明書局。1968年，頁81。

郁達夫，《南遷》。香港：智明書局，1958年。

郁達夫，《郁達夫日記》。香港：一知出版社，1961年。

郁風編，《郁達夫海外文集》。北京：三聯書店，1990年。

鄭子瑜，〈郁達夫的南遊詩〉。《南洋學報》，12(1)，1956年。

第十三章 從文化交流看郁達夫與陳馬六甲的跨境之旅

鄭遠安，〈郁達夫師在望嘉麗〉。陳子善、王自立編，《回憶郁達夫》。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年。

鈴木正夫(Suzuki Masao)，《スマトラの郁達夫：太平洋戦争と中国作家》。東京：東方書店，1995年。

陳嘉庚，《南僑回憶錄》。新加坡：南洋印刷社，1946年。

陳子善、王自立編，《郁達夫研究資料》。花城出版社，1986年。

陳崇智，《我與一三六部隊》。新加坡：海天書局，1994年。

陳達，《浪跡十年》。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

黃傲雲，《中國作家與南洋》。香港：科華圖書出版公司，1988年。